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0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

目 录

短 論	包产一定要落实.....林一舟(1)
	农业生产措施要同群众商量 决定.....洪 禹(3)
	为了追求真理.....施东向(32)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薛暮桥(7)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翦伯赞(21)
	关于水电和火电问题的讨论.....李 銳(34)
	自动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楊重光(45)
	編者的話.....(31)



包产一定要落实

林 一 舟

领导农业生产，組織今年农业生产的繼續跃进，要抓許多环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包产。

包产，是公社和生产队、社員之間的一种協議，一种合同；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公社根据包产数字拟定农业方面的收益分配方案。公社以下的核算单位（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根据包产数字来支配由自己管理的各种收支。超过包产的部分，絕大部分或几乎全部归包产单位的社員群众所有。包产数字又是国家分派农产品征購任务的一个重要依据。通过包产数字的拟定，就使一年的生产和分配的輪廓更加明朗化，使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更直接地联系起来，使国家利益、公社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更好地結合起来。通过包产体现出来的这种清楚明白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农民熟悉、妇孺皆知。根据过去的經驗，只要处理得好，就会对生产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包产問題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包产指标是否落实。包产指标不应当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空想出来的。在确定包产指标的时候，决不能以願望作为根据，以感想代替实际；不能以为指标定得愈高愈好，不能把亩产在实际上只能达到五百斤的，定

成一千斤，一千五百斤，甚至更多，实际上做不到。必須对去年当地各种土地上的产量多少，去年比前年增产多少，今年能够增产多少，有什么可靠的增产措施，等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調查和分析。在切实估計到当地人力、物力、財力的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既要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实际存在的困难条件，并要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使計划指标尽可能地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討論，共同作出决定。因为一般群众对当地土地和生产上各种实际条件的了解，比干部是会要清楚些。当然，其中也有某些有保守观点的人，但是，一般說来，农民群众对自己耕种的各类土地要采取什么措施以及因此可能达到的产量的估計，是比较实际，比较可靠的。而且，要克服群众中的某些保守观点，也只有依靠实际的經驗，首先是依靠一批試驗的結果。

經過群众討論，才能反映群众要求，集中集体智慧，使包产指标成为领导与群众共同决定的指标。这样，包产指标才能真正为群众所掌握，真正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奋斗目标，才能鼓舞他們的干劲，激励他



們的生产积极性。包产指标能否达到，全靠社員的双手，全在于他們干劲的大小和积极性的高低。經驗証明：凡是群众不同意、不接受的計划和指标，勉强实行，硬着来做，往往是行不通、办不到的。

有人担心，这样一来，群众会把指标压得很低。当然，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小集体和大集体的矛盾，这是需要相当時間才能逐步解决的問題。这种矛盾，有时表现为小集体的本位主义，有时表现为大集体的过分集中。当前情况必須注意的，是某些上級的干部对生产指标层层加码，要求过高，同时，对小集体的利益照顧不够，对生产的领导过分集中。因此，必須說明：包产指标如群众不同意就不能算数。小集体和大集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是他們共同商量問題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是能够达成一个大家都比較滿意的协定的。

包产中有一个留有余地的問題。現在很多地方在包产的时候，把包产指标定得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一些（例如低百分之十到二十），給包产的生产小队或者生产队留下超产的余地，使他們真正有可能超产，因而有奖可得，从增产中得到較大的实惠。我們認為这种办法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大大鼓励和刺激农民群众的增产积极性。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时刻想到使我們的政策措施适合群众的要求，这是我們党和毛澤东同志所一貫坚持的原則；我們必須在确定包产指标这一类的問

題上，認真贯彻执行这个原則。至于群众当中有少数或个别的人可能产生的指标愈低愈好、留的余地愈大愈好的、不尽合理的、本位主义的想法，通过共同商量討論，在群众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一致性認識的思想基础上，是可以克服的。对增产的实际可能性估計不足，把指标定得太低，因而使生产措施松懈下来，这种偏向也是要尽可能地防止和糾正的。

我們強調包产指标要切合实际，也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两脚踏在实地上，使生产跃进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們的工作才有把握，基层干部和社員群众才会真正下决心、有信心去完成和超额完成所定的指标。指标愈切合实际，他們这种决心和信心也就愈強，跃进的劲头就会更大。相反地，如果超过实际可能，自己根本无把握，群众根本不相信，这同真正的跃进是毫不相干的。过高的指标，脱离实际的指标，不但不能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挫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指标定得过高，誰也达不到，只是說說而已；如果定得切合实际，是經過努力可以达到的，群众就会認真对待，爭取实现。

包产指标落实以后，我們对产量就有个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把握，国家征購、公社积累、社員分配等等的绝对数字，就可以比較实际地預定下来。这样，干部心中有底，工作主动；群众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干活有劲，許多事情都会好办得多。这样，我們整个計划指标的实现，就会更有保証。



农业生产措施要同群众商量决定

洪 禹

农业生产措施是否恰当，是一个对于作物生长和收成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问题。福建日报一篇通讯所提供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福建南安县卫星公社蒲山红大队的生产措施，由于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的结果，实行了“丘丘田地合理密植”的科学方法，因而使今年早稻的生长情况十分良好。这篇通讯说，现在那里已经是“丘丘葱绿、丛丛粗壮”，而且每丛秧苗分蘖达到“二十多本”（按：本，即枝或条）。

根据他们的经验，生产措施应该适应不同的条件而有所不同。比如密植问题，他们全大队一千零八十亩早稻田，就有六种不同的密植规格。有一个小队的七十三亩早稻田就分为三类，而且每类田根据土质肥瘦、地势高低、作物品种特性等不同条件，又分出各种不同的插秧规格。对于肥沃的田地，由于促使秧苗分蘖的力量较强，密植程度就要低些。分蘖力强的品种，每丛秧苗就要少插些，而容易倒伏的品种，就应该插在较瘠瘦的土壤上，等等。有的田比去年插得密些，有的和去年一样，有的比去年疏些。总之，种植太疏了不好，

太密了也不好。

象蒲山红大队这种细致地、一块块土地分别对待的生产措施，决不是少数人坐在屋子里凭着好心的愿望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采取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组织了当地的老农、青年、壮年、妇女、干部，采取了小会讨论、登门访问、田头商量、大会定案等一系列的办法得出来的。可见，具体的生产措施问题，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作硬性的规定，而是应该集中当地农民群众的意见，共同商量决定，因为群众最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的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情况，最熟悉每一块土地应该怎样耕种。

由于这些生产措施是经过群众商量决定的、是群众自觉采取的，因而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这篇通讯所说的，蒲山红大队的社员们，由于生产计划、生产措施是同他们商量决定的，所以他们“口通、心通、手通”，满怀信心地进行中耕除草，加强田间管理，掀起积肥高潮，积极抢救受灾的庄稼。那位半夜冒着暴风雨到山田里排水的老大说：“现在生产是共同研究、共同决定、共同负责、共同执行的，还能眼看庄稼受灾不救吗？”社



員們認為，今年密植規格有他們的“一份主張”，他們“一定要力爭各項措施的實現”。這些情況說明，滿山紅大隊的社員們是在以他們堅定的意志和積極的行動，力爭今年早稻的丰收。

此外，我們看到有一個關於福建海澄縣蓮花公社密植措施的材料，其中說：該縣要求農民群眾插秧時執行硬性規定的統一密植規格，弄得群眾和幹部都很為難。但是，五一生產大隊的支部根據當地的情況 and 群眾的要求，變通了縣級的規定，決定按照當地的合理密植規格插秧，群眾非常高兴，渾身是勁，原來計劃清明以後七、八天才能完成插秧，後來他們自己提出了保證，要在清明前完成任務；本來規定早晨五點起床，有的人一點多鐘就起來干了。

可見，在絕大多數的場合下面，並不象有些人所擔心的，同農民群眾共同商量決定生產措施，會產生“落后、保守”，會使群眾“缺少干劲”。

從滿山紅、五一大隊和其他各地的經驗看來，由於土、肥、水、種、氣候、地點等等自然條件的不同，以及農民耕作經驗、技術水平和田間管理水平高低的不

同，農業生產的技術措施，決不能千篇一律。象滿山紅一個地方就有那麼許多差別情況，至於全國各地當然更是千差萬別。比如蕃薯究竟插雙行還是單行的問題，我們從其他材料上看到，福建省的另一個公社，去年的經驗是：沙質地里的薯塊又大又美，粘濕地里的薯塊不大又有臭薯。根據這種經驗，他們今年就採取分別對待的辦法，沙質地插雙行，粘濕地插單行。可見，農業的具體生產措施，甲地的規格，對於乙地就不一定適宜。

有些人以為，生產措施的規格是愈統一愈好，他們沒有估計到，一種統一的規格不可能適應於千差萬別的耕作條件。而且，密植等類措施，如果不和農民商量，不注意當地當時的條件，不注意他們的具體經驗，正如前面所說，不只會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還會很大地影響幹部同群眾的關係，也影響幹部本身的積極性。經驗證明，為了使我們的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具有充分可靠的現實可能性，同時，又使農民群眾對於實現指標具有高度的積極性，從而達到增產的目的，一定要將生產措施問題，連同生產指標問題，一起經過同農民群眾充分商量，再作決定。

附：滿山紅大隊幹部和群眾 共同制訂密植方案

南安衛星公社滿山紅大隊，制訂
早稻密植方案 and 生產計劃時，與社員

群眾共同商量、共同決定、共同負責、
共同執行，做到生產民主，措施落實，



社員心情舒暢，生产搞得很好。

反复商量，干部、群众 共同制訂密植方案

这个大队今年为了繼續大跃进，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发动社員广泛討論、总结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的經驗，来制訂今年繼續大跃进的生产规划和合理密植等增产措施。在制訂早稻密植方案时，各生产队以食堂为单位分別召开了好几次社員大会，发动社員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挺进小队老农尤世川說：“上級号召我們农民要增产，农业‘八字宪法’每个字我們都拥护。”但怎样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他認為應該大家商量办事，密植不能千篇一律。如火泰境的一片平原田，去年插得过密，丛行距 3×3 寸（按：被乘数是行距，乘数是丛距。下同），結果亩产才二百斤。比同等田地插 6×4 寸的产量差了一大半。經過充分討論后，全大队的社員初步提出了八种密植規格。为了統一意見，把密植方案訂得更切合实际，党支部組織各队选派老农、青年、壮年、妇女、干部等各方面的代表，集中討論，根据地区土地、品种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和去年的成功經驗，共同商量密植的丛行距，决定采用 5×4 寸， 5×5 寸， 6×4 寸， 6×5 寸， 6×6 寸， 7×6 寸等六种規格，然后又拿到社員大会上再度討論，最

后定案。社員們看到干部再三征求群众意見，十分高兴，連老人、妇女都相繼参加討論，七十三岁的老社員尤世象兴高采烈地抱着小孙子到会上参加討論；过去很少說話的老农尤世川也一手提灯、一手扶拐地来到会上积极发言，他說：“生产講民主，有我一份，我怎能不作參謀呢。”挺进生产队的社員們，晚上討論后，連夜拿着尺子到田里認真測量計算，确定合理密植規格。在社員再度討論的同时，各队干部还挨家挨戶登門訪問、征求意见，有的在食堂，在田头，甚至在跟社員一起拾粪时，也和社員共同商量，征求对这六种密植規格还有沒有修改意見；直到大家同意后，才最后定案。东方紅生产队社員陈貴长說：“今年密植規格有我一份的主张，也是大家出的主意，我們一定确保各項措施的实现，力爭早稻大丰收。”美滿生产队老农陈季匣說：“生产大事應該由干部和群众共同商量，这样人多計謀深，才会考虑更周到，粮食大丰收才更有保証。”

群众口通、心通、手通 丘丘田地合理密植

滿山紅大队和社員共同制訂密植方案后，又在插秧之前，召开社員大会，放手发动群众，討論了因地制宜地合理密植。因此社員心情舒暢，主动



認真執行密植規格，做到了口通、心通、手通。挺進小隊有七十三畝早稻田，社員把它分作三類：第一類是平原田，分三種不同規格插秧，在塘口一片黑土壤，土質好，插 6×5 寸和 6×4 寸；在壠內一片也是黑土壤，但土質更肥沃，分蘗力強，則插 7×6 寸。第二類是半山田，也分兩種規格插秧，在墓後一片是赤土壤，土質比較差，不易分蘗，就插 5×4 寸；在畹建的一片同樣是赤土質，但地勢比較高，分蘗力比較強，則插 5×5 寸。第三類是沙質土的山田，也分兩種不同規格插秧，有的插 4×4 寸，有的插 5×4 寸。全大隊一千零八十畝早稻田地，在社員自覺執行密植規格下都因地、因品種、因自然條件合理密植。在五百五十九畝山田和半山田，有的田地比去年插得密一些，有的田地維持去年的密植程度，有的田地還比去年插得更稀一些。例如三十五畝肥沃的門口田和溝頭田，去年採用 5×3 寸密植，由於插得過密，結果每畝平均只收四百九十斤，比山田的產量還低，今年根據老農意見稍為放寬些，按 7×6 寸密植，結合加強管理，合理追肥，促進大量分蘗，以保證每畝有一定有效穗數。

各種稻田除了分別採用了不同密植規格外，還根據各種條件，因地制宜地採用了不同本數，如南特號分蘗

力較強，每叢插八至十本；粳稻和紅米早分蘗力較弱，每叢插十至十二本。容易倒伏的南特號，插在較瘠瘦的田地，不易倒伏的粳稻插在較肥的田地，促使各種品種都能在適宜的田地上正常成長。

稻苗挺秀，社員滿懷信心爭取夏季大丰收

滿山紅大隊放手發動群眾推行合理密植後，全隊插秧進度很快，比去年提早一個季節插完早秧。目前丘丘蔥綠、叢叢粗壯，稻苗每叢已分蘗到二十多本。社員們滿懷信心地在稻田里中耕除草、加強管理，並掀起了積肥新高潮，每天積制火燒土、綠肥、衛生肥等二千多担，準備給早稻田增追更多的優質肥料，爭取夏季大丰收。石橋生產隊以老農、技術員為主組成田間管理專業隊，認真研究稻子生長情況，保證管好稻田，前幾天一個午夜，突然刮大風下暴雨，挺進生產隊老農尤傳貓被風雨吵醒後，立即點着燈、拿着鋤頭跑到一里多遠的山田去排水，直至下半夜一時排完了田水才回家，使稻苗免受損失。他向老伴說：“現在生產是共同研究、共同決定、共同負責、共同執行的，還能眼看庄稼受災不救嗎？”

（福建日報，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薛暮桥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向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所发生的作用。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出版，在我国引起对上述问题的学习热潮。当时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还广泛存在，这是没有问题的，谁也不会怀疑。但是，在当时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生产，除受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外，是否还受国家计划控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它们是否也起作用？对这些问题却是有争论的。

在一九五六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又进一步展开。当时讨论的中心是：国营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是不是商品？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有多大？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中是否还占重要地位？这些问题经过几年的讨论，虽然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但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无疑是显著地提高了。不用说，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的正确解决，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有重要意义的。

人民公社的诞生，使商品生产有了若干新的变化，有些人在认识上曾经一度陷入混乱状态。有些同志认为，人民公社已经接近于全民所有制了，而且快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因此他们认为商品生产快要消亡，价值规律也快要不起作用了。他们的根据是：第一，既然人民公社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大体上满足公社和全体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就不需要再发展商品生产了。第二，既然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随着供给部分的迅速扩大，而供给部分又采取实物形式，因此不久以后，就没有必要采用商品



貨物的形式來進行消費品的分配了。第三，有些同志認為，只要“政治掛帥”，農民就再不會計較收入的多少，國家同公社的交換就不必要遵守等價的原則，甚至可以無償調用公社的產品和勞動。這些混亂思想如不迅速澄清，將為國家和公社帶來重大的損失。因此，在這時候，對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研究，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為着敘述上的便利起見，我對這個問題的說明，將先從社會主義的交換關係的具體分析開始，說明我對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問題的一般的看法，然後回到人民公社化以後所提出的關於商品生產的一些問題。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三種性質的交換

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勞動產品，除了一部分自給性的農產品外，一般都要經過交換過程，才能從生產領域達到消費領域，完成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部過程。社會主義的交換關係，是由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決定的；但交換關係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交換關係的研究，將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獲得更具體的認識。

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產品所以必須互相交換，不僅由於生產的高度社會化，必須有數以萬計的企業來分工生產各種社會產品，這些企業在生產中必須互相交換其產品；更加重要的是，由於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兩種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且還存在着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進行分配的制度。這樣就使這些社會產品的交換，一般地還必須遵守商品交換所通行的原則。在社會主義社會，大體上存在着三種不同性質的交換。

第一，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同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社（或公社）之間的交換，或者這一個合作社（或公社）同那一個合作社（或公社）之間的交換。交換的雙方，是生產資料和產品的不同的所有者，它們各自以自己的產品去同對方進行交換；經過這種交換，產品就從這一個所有者轉移給另一個所有者。這樣的交換，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不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的交換，因而同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的性質根本不同。但是，由於它還是兩個不同的所有者之間所進行的等價交換，所以它同一般的商品交換還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別。

第二，國家把國營企業所生產的消費品和從合作社（或公社）購買來的消費品，經過交換分配給千百萬消費者，這是另一種性質的交換。這種交換與前一種交換不同，不是產品同產品的交換。在這裡，消費者並不提供任何產品，他們提供的只是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和由此取得的一定數量的貨幣。交換的過程不是“產品——貨



币——产品”，而是“劳动（为自己劳动部分）……货币——产品”。因此这种交换，实质上是消费品的一种分配方式。但是，这种交换同样要遵守等价（等量劳动）的原则，而且消费品经过这种交换，就从国家所有变为消费者个人所有，可以由消费者来自由支配。因此，这种投入市场的消费品，同一般的商品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第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形式上同第一种交换类似，但实质上经过交换以后，商品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仍然是国家所有。不过在现行的经济管理制度下，由于这些国营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都必须各自计算盈亏，所以在交换时候，一般地仍然必须遵守等价的原则。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交换同一般的商品交换也有部分类似的地方。

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把这三种交换关系明确区别开来，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并通过交换来达到不同的目的。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对待这三种不同性质的交换。

第一，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1）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主要属于全民所有制，农业生产主要属于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国家才能够取得集体所有制经济所生产的农产品，从而掌握全部社会产品，进行有计划的调配；集体所

有制经济才能够取得国营企业所生产的工业品（包括它们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and 它们的社员所需要的消费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2）在存在着两种所有制的条件下，只有等价交换，才能保证交换双方的应得的利益，才能最有效地鼓励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要按照国家计划，用商品的形式出卖给国家。在交换中价格的高低，对人民公社的收入多少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在现阶段，这种商品交换仍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即使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不会改变产品的交换部分继续扩大的趋势；不过由于所有制的改变，这种交换的性质也将跟着改变，即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性质的交换，变为第三种性质的交换了。

第二，国家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由于按劳分配制度的存在，也显得十分重要。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提供劳动要取得报酬，领取各类消费品要支付代价，这里就存在着等价交换的必要性。在按劳分配制度下，社会产品还不丰富，劳动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以及各人的需要和嗜好不同，不通过商品货币形式而直接进行实物分配，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所以大部分采取实物分配的形式，这与目前农业中自给性的生产还占优势有关。经过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产品中的商品性部分不断扩



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需要也更加复杂的时候,就有必要逐步缩小实物分配的部分,扩大通过商品货币形式进行分配的部分。从最近苏联集体农庄逐步改行货币工资制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只有到将来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可以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时候,通过商品货币形式来进行分配的办法才有可能逐渐消亡。

第三,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間的交換,也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国营企业互相依存,必須互相交換其产品才能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同时,为着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必須督促各企业进行严格的經濟核算。为着經濟核算,各企业在互相交換其产品的时候,也必須采取等价交換的原則,使它們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补偿。这种交換关系一旦中断,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够繼續生产。如果交換时候不采取等价的原則,价格想高就高,想低就低,就会使国民經济陷入混乱状态。

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等价交換,与国营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等价交換,国家和消費者之間的等价交換的性質是不同的。在后两种交換中,价格的高低,都会影响某些劳动人民应

享受的物質利益。比如,农产品采購价格的高低,不但会影响公社的收入,而且会影响它的社員——农民的收入;消費品零售价格的高低,也会影响工人、職員和农民的收入。因此,等价交換是为保证劳动人民应得的利益,是为保证按劳分配原則的正确实现。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价格高低虽然也影响各企业的收入,但除小量的奖金外,基本上并不会影响企业中职工的收入;因为他們的工資标准,同企业盈利的多少无关。但是,在两种所有制并存,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条件下,前一种交換和后两种交換总是要互相影响的。特別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为着督促各国营企业增产节约,改善經營管理,也采取了各种物質鼓励的办法。各国营企业在努力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生产計劃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完成盈利上繳的任务,并力争超額提奖。它們在互相交換中,也不願意讓自己吃亏。因此,各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从整个国家來說,已經是国家内部的产品分配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商品交換的形式来实现产品的分配;但从各个企业來說,它們在交換中同样必須在一定的程度上計算各自的物質利益,因而同一般的商品交換也沒有十分重大的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政策

前面講的三种不同性質的交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采取等价交

換的原則。只有等价交換,才能保证集体所有制經濟在出售其产品以后,能够换回



同量价值的产品；保证劳动人民用他们的货币工资，能够换回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扣除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相等数量的消费品；保证各国营企业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补偿。所谓等价交换，就是每一种产品都按照它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

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价值，还必须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因而还必须为各类产品规定适当的价格。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政策，基本上应当以各类产品的价值为基础，尽可能符合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但是，由于各类产品的价值难于精确计算，而且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中，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还是不断会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也可能使价格在一定范围内背离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必要经常研究价格政策，必要时也要用调整价格的办法，来调整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数量，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具体办法是：

第一，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产品的生产数量，以保持各类产品供需之间的平衡，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生产，基本上是由国家计划来调节的；但国家在调节各类产品的生产数量的时候，必须正确掌握价格政策。特别对集体所有制经济所生产的各类农产品，正确掌握价格政策更有重要意

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规定工业品同农产品的比价，和各类农产品相互之间的比价（如粮食同棉花的比价）；必要时可以用调整比价的办法，来影响各类产品的生产数量。过去几年，我们曾经稍稍提高棉花的价格，来奖励棉花的增产；也曾稍稍提高猪的价格来奖励养猪，这些措施都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经验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把某一种产品的价格定得太低，这一种产品就会减产，就会完不成国家的生产计划。

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生产，都是由国家计划来调节的，国家在调节生产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价格政策。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对的。不错，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国家利用价格政策来调节生产的事实似乎愈来愈少了。但这并不是说价格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而是由于我们的价格经过几年来的调整，已经大体上合于比例，能够保证国家所要求的工业同农业之间，和各类农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实现。价值规律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东西，当你没有违背它的时候，它似乎并不存在；如果违背了它，它就立刻出现了。可以设想，假使我们真的把一吨棉花的价格降低到同一吨粮食的价格相等，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一定是种棉花的合作社或公社大量亏本，因而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否则就会因此破产。总之，棉花的产量就会大大减少，就会迫得国家不得不提高棉花的价格。



我們的社會產品種類繁多，數以千計，每一種產品還可能有許多種不同的規格和花色；我們現在只能夠把幾百種重要產品列入國家計劃。在工農業生產中，列入國家計劃的主要是重要產品，這種產品種類很少（當然，列入計劃的都是大量生產的產品，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還是很大的），有很多種次要的工業品、農產品和土特產等不列入國家計劃，國家主要通過加工訂貨合同等辦法來進行調節。對於這一部分產品，價格政策就起比較大的作用。即使對於列入國家計劃的產品，也必須規定適當的價格。各國營企業在完成了國家的生產計劃以後，總願意多生產獲利比較多的產品，少生產虧本的產品，價格的高低對企業生產某些產品的積極性也會有一定的影響。當然，對於國營企業的生產，在規定了適當的價格以後，國家主要通過國民經濟計劃和訂貨合同等方式來進行調節；對於人民公社所生產的主要產品也是這樣，濫用價格政策也是不適當的。

第二，利用價格政策來影響某些消費品的銷售數量，通過流過程來保持各類消費品供需之間的平衡。國家在出售消費品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價格政策，有計劃地來擴大或縮小某幾種消費品的銷售數量。例如我們在白糖過多的時候，曾經減低糖價，使白糖的銷售數量顯著增加；在白糖不足的時候，也曾經適當地提高糖價，來限制銷售數量。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利用提高煙酒價格的方法，來限制煙酒等產品

的銷售數量；有些國家還用提高某些高級消費品的價格的辦法，來限制這些高級消費品的銷售數量。對於糧食（麵包）和某些藥品、書籍、文具等，則往往採取薄利廣銷的政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購買力雖然可以由國家計劃來控制，但消費品的品種和花色，則讓人民自由選擇；因此，通過價格政策來影響各類消費品的銷售數量，便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主義國家由於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許多種消費品的供應常常滿足不了需要。因此，不可能也不應該濫用提高價格的辦法來限制這些消費品的銷售數量。特別對於人民生活十分必需的消費品，更不能輕易提高價格，以免在實際上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種場合，就必須採取定量供應的辦法，來限制銷售數量，使這些消費品的分配達到公平合理。我國目前對糧食、食油和棉布等的定量供應制度，無疑地是完全必要的措施。如果不是這樣，而採取提高價格的辦法，則對收入多的人民所起的限制作用不大，而對收入少的人民則是相當沉重的負擔，有可能因此而使他們不能滿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因此，利用價格政策來影響某些消費品的銷售數量，也象利用價格政策來影響某些產品的生產數量一樣，是可以利用的一種辦法，但不應該濫用這種辦法。

第三，利用價格政策來調整各階層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別是調整工人同農民之間的消費基金的分配。消費品的價格，同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人民的货币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就等于提高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就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的时候，通常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货币工资，另一种是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采取后一种办法，不但提高了职工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等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也就相应地降低一些国家的积累。因此，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是调节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极重要的杠杆。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适当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但是，在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的时候，除不使这些消费品因降价而脱销外，还应当保证国家的积累仍然能够不断增长，从而有可能不断地扩大建设规模，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在存在着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是调节工农生活水平的极重要的杠杆。农产

品采购价格的高低，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它们的社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调整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调整农业税，另一种是调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我国在过去几年，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显著地低于工人。国家为着调整工人同农民之间的生活水平，除适当控制职工的工资标准外，还有必要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原来的基础上稍稍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就把各类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分别提高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因而使农民除了从农业增产方面增加的收入外，还从价格方面多得了几十亿元收入，使农民生活得到了相当显著的改善。到将来农村人民公社逐步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将要不决定于公社收入的多少，而决定于国家统一的工资标准；那时通过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调节农民生活的作用，也就跟着消失了。

根据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经济核算

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必须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马克思说：“簿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对于手工业经营及自耕农经营的分散的生产，更为必要；它对于社会共同

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资本论”第2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页）我们的经济核算是要核算什么呢？首先是要核算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生产中的各种物质消耗），要



使各个企业按一定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所得到的货币，能够充分补偿生产中支出的工资和各种物质消耗；此外，还能够取得一定数额的盈利来作为国家的积累。在这里，产品的价格和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和燃料（这也是其他企业的产品）等的价格，就十分重要，是决定着核算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为着正确进行经济核算，在規定各种产品的价格的时候，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根据呢？这是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国营企业各种产品的价格的唯一可以采取的依据，就是价值，就是生产这件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不是可以采用别的依据来决定价格呢？不能。因为只有价值是各种产品共同的、可以互相比較的东西，而且我們经济核算的目的，也是为着节省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不是可以把各个企业在生产这件产品的时候所消耗的个别的劳动量，而不把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价格的依据呢？也不能。这样就不能奖励先进的企业，鞭策落后的企业；而且这样就会由于各企业的价格沒有共同的标准，而使各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无法互相比較；也就是說，无法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使各企业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得到补偿，必須基本上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規定各种产品的价格，各企业在互相交换其产品的时候，也必須基

本上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国营企业，必須用基本上符合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格，来互相交换其产品。如果这些产品的价格，有的显著地高于它的价值，有的显著地低于它的价值，那末有一些企业就会得到額外的盈利，有一些企业就得不到应得的盈利，甚至还会亏本。如果根据这样的经济核算，来評定各生产部門和各企业经营的好坏，就会由于受不合理的价格的影响而作出錯誤的結論。某些产品的价格过高或过低，不但会影响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核算，而且会影响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核算。如果煤炭的价格定得过高或过低，則不但会影响全体煤炭工业的经济核算，而且会影响大量使用煤炭的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等的经济核算。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核算陷入混乱状态。

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利用基本上符合于其价值的价格，来进行生产中的经济核算，而且利用同样的价格，来计算投资的效果，并根据它来考虑投资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经济部門的投资分配（也就是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是通过国家计划来实现的。但是，在决定究竟什么样的投资比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有益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地也必須通过价格来进行经济核算。比如，我們要决定多发展煤炭工业，还是多发展石油工业（如果資源沒有問題），对国家更有利益，



就必須正確規定煤炭和石油的價格。如果這兩者的價格，一個是顯著地高於其價值，一個是顯著地低於其價值，那末根據這樣的價格所作出的經濟核算，就一定是不正確的。如果據以決定國家的投資方向和投資的比例關係，就有可能使國民經濟受到重大的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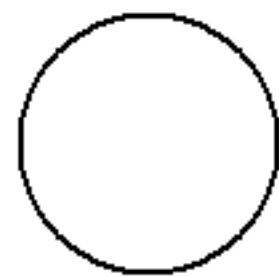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國家對某些非生活必需的消費品，有時需要採取高價政策，即以高於其價值的價格出賣給消費者；象煙酒就常常是高價出售的。在這場合，國家可以把價格高於其價值的部分，作為貨物稅或周轉稅另行征收，使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仍然只能得到一般的盈利。社會主義國家有時還需要用低於其價值的價格，把某些農業機械出賣給農業生產合作社或農村人民公社，這時國家可用正常的價格向工廠收購這些產品，然後低價出售，差額由國家來補貼。採取這些辦法，使生產這些產品的工廠，仍然以大体上符合其價值的價格出售其產品，是很有利於國家的經濟核算的。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核算，還必須以價值為根據，各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還必須遵守等價的原則。有些同志機械地根據國營企業同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所有者沒有改變這個事實，來否定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利用商品、貨幣、價值等形式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重要意義；甚至認為，在這樣的交換中，“等價交換的原則已經失去意義”。這樣的認

識，無疑地對我們的經濟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社會主義國家國營企業的經濟核算，是建立在按勞分配制度的基礎上的。企業的產品的價值，如果除去物化勞動部分（生產中的物質消耗），就是職工所提供的活勞動。而所謂物化勞動，也是由其他許多企業的活勞動構成的。職工所提供的活勞動，大体上等於企業付給職工的工資和企業的上繳盈利（包括稅款）。既然職工的工資大体上等於職工所提供的勞動的為自己的部分，而盈利則大体上等於他們所提供的勞動的為社會的部分，那末，企業的生產品成本（工資加物化勞動部分）加上繳盈利，就應當同企業的產品的價值相等。因此這種經濟核算，還是同按勞分配制度密切聯繫的；也就是說，同勞動者個人利益的計算密切聯繫的。到將來共產主義時代，情況就完全不同。勞動者的收入不決定於他們所提供的勞動的多少，而決定於需要。在企業的經濟核算中，就沒有工資這一個項目。這時企業在核算勞動消耗的時候，就同勞動者的個人利益絲毫不發生關係，純粹是社會內部的核算了。從這個意義來講，共產主義時代雖然同樣也要進行經濟核算，在企業同企業之間可能也要計價算賬，但同物質鼓勵已經脫離關係，因而它同社會主義時代的經濟核算和等價交換，已經性質不同了。

以上對價格問題的研究，同時也說明了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價值規律所起



作用的問題。列宁曾經指出：“价格是价值規律的表現。价值是价格的規律，即价格現象的概括表現。”（“列宁全集”第20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4頁）可見价格政策問題，也就是如何利用价值規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問題。价值規律是客觀存在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东西；而价格政策則是主觀規定的、是人們对价值規律的具体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存在，价值規律就一定要起作用，要它不起作用是不可

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規律不是作为不受人們支配的自发力量而起作用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价值規律的作用已被国家自觉地、有计划地利用，利用它来达到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当然，国家在利用价值規律的时候，还必须遵守产品的价格必须大体上符合其价值的規律。如果我们严重地违反了价值規律，那末价值規律就仍然有可能违反人們的意志而自发地發揮它的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

我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商品生产仍将繼續发展。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自給性的生产还占优势。这种情况，并不表明我国的农业已經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表明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还没有完成从自給性生产到商品性生产的轉变。目前我国粮食的商品率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就是說，要用四分之三的人口来进行农业生产，才能保證全国的粮食供应。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后，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可以降到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一点，粮食的商品率自然就要大大提高。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后，农业生产所消耗的机械、石油、电力、化学肥料等都会大大增加，其中絕大部分是不能由公社自己生产的，因而也有必要出售大量的粮食

和其他农产品，来換回这些生产資料。总之，生产的技术水平愈高，生产中需要互相交换的产品也愈多，愈需要較大范围内的分工协作。那种認為我国的农业生产可以朝着自給自足方向发展的想法，显然是违反社会經济发展的客觀規律的。

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后，种粮食的农民可以大大减少，人民公社就可以抽出大量的劳动力来发展多种經營，发展工业生产，从而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又将繼續扩大。有些同志認為，农村人民公社执行了农林牧副漁、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方針，就会朝着自給自足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幻想。由于各个地区的生产条件不同，把人民公社发展成为一个自給自足的单位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經济上是不合算的。事实上，人民公社决不可能生



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大部分要靠国家和其他公社来供应。而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又大部分远远超过自己的需要，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可能是自己不需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人民公社可以不要努力发展自给性的生产；公社的自给性生产也要发展，应当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公社及其社员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凡是有条件自己生产，而且在经济上又合算的，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生产。但因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不同，在共同发展中仍需要有分工协作，互通有无。过分强调自给自足，不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国家和公社都是不利的。

跟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将逐步提高，农民生活资料中商品性的部分所占比重也将愈来愈大。现在我国农民的全部生活开支中，单单粮食一项就占一半上下，因此自给性的部分占着很大的比重。若干年后，跟着生产的飞跃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情况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们就会愈来愈多地需要现代工业所生产的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单单依靠公社所生产的一部分工业品，显然是不可能完全满足它的社员的全部需要的。而且，随着公社工业的发展，在公社内部也必须发展商品交换，而不可能完全采取直接分配的办法。因此，不仅从生产方面来说，就是从消费方面来说，也有必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有些同志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现在已经采取了工资制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如果供给制的部分渐渐扩大，消费品的分配通过商品货币形式的部分就会渐渐缩小。这也是不合于实际情况的。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基本上采取按劳分配的制度。即使在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只要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能够满足全体人民一般的生活需要，就必须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制度。在今后若干年内，工资部分不但不会缩小，而且还要适当扩大。即使供给部分，也可能要采取商品货币的形式。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他们的生活需要就愈来愈复杂；为着满足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就必须利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进行分配。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采取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进行消费品的分配，比较容易得到消费者的欢迎。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农村人民公社快要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公社的产品也归全民所有，因此就用不到发展商品生产了。实际上，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过程。即使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公社的产品也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仍然必须互相交换，仍然必须等价交换。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不能改变产品中需要交换的部分继续扩大的趋势。现在许多大规模的现



代化的国营企业，有哪一个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单位呢？在目前，国家同公社之間必須保持等价交換的原則，承認价值規律还起作用。就在公社內部，为着进行經濟核算，公社同各生产队和社营企业之間也有必要进行等价交換，各計盈亏。否則，就会使国家和公社的經濟核算陷于混乱，造成极大的浪費，甚至还有可能損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除規定的农业稅外，不应当无偿調用公社的产品；公社一般也不应当无偿調用生产队和社营企业的产品，調用时都必須計价算賬。

总之，在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建立起来

以后，我們还有必要发展商品生产，繼續执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換的原則，还有必要繼續遵守价值規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說：“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繼續发展商品生产和繼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則，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經濟是两个重大的原則問題。”过早地否認商品生产、商品交換、貨幣制度、价值規律等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錯誤的。

对几种不同意見的商討

几年来，我国的經濟科学工作者和經濟工作者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方面，有些同志認為，只有两种所有制之間的交換才是商品交換；国家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已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換；各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就已經不是商品交換，只保存商品的外壳了。有些同志認為，上述三种交換基本上都是商品交換，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因为上述三种交換，既然交換双方都还必須在不同的程度上計較各自的物質利益，因而都必須基本上遵守商品交換所通行的原則，即按照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等价交換，那就應該承認这些交換都还基本上保存着商品交

換的性質。

有些同志認為，对商品交換所作的后一种解釋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于許多經典著作中的說法。應該說明，我們討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而不是私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更不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換在数量上仍将繼續增长，但这时候，在質量上則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的内容正在逐步消失。如果一定要内容十分完整才算商品，那末連两种所有制之間的交換也不能算是商品交換。如果有商品的内容就承認它，有几分就承認几分，那末前面所說的



三種交換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商品交換的性質。一方面承認它們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它們的差別性。指出這三種交換不但與私有制度下的商品交換根本不同，而且三種交換方式的本身，也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性質，應當區別對待。我認為，採取這樣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解決實際問題。

在價值規律所起的作用方面，有些同志認為，所謂價值規律還起作用，是指它對產品的生產或銷售還起調節作用。因此對國營工業所生產的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已經不起作用；對人民公社所生產的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也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對不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才起比較大的作用。有些同志認為，只要產品還必須按照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等價交換，就證明價值規律還起作用；因此即使對國營工業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也起作用，因為它仍然必須遵守按照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等價交換的原則。

我認為，上面所說的價值規律的兩種作用，實際上只是一種作用的兩個方面。價值規律要求各種產品的價格，都必須以它的價值，即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為基礎。^①這是價值規律所起作用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某種產品的價格高於或低於它的價值，那就會影響它的生產數量或銷售數量（反過來，如果產銷不平衡，也有可能影響產品的價格）；也就是說，

價值規律對這種產品的生產或銷售（或價格）起調節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的前一種作用，必須受到普遍的重視，即使國營工業列入計劃的產品也不能例外（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價值規律的後一種作用，只有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已經受到國家計劃的嚴格的限制。但這並不是說價值規律已經不起作用；它還是在起作用，在衝擊着我們的國家計劃。如果價格和價值背離過大，它的衝擊力量仍有可能影響生產和銷售數量，甚至有可能破壞國家計劃，破壞供需間的平衡。特別對於集體所有制經濟和不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的衝擊力量所發生的破壞作用就更大。這時國家仍有必要用調整價格的辦法，來保證國家計劃的實現和供需間的平衡。

價值規律是客觀規律。既然是客觀規律，它就不能由人們的意志來改變。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圖，有意識地運用客觀規律，是完全可能的，但必須以遵守客觀規律為條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有可能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而不使其自發地調節生產，發生破壞作用。但從可能變為現實，還必須認識它、掌握它。假使你違反了客

①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所作價值規律的定義是：“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按照這一規律，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是以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為基礎的。”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9頁。



觀規律，它就仍然要自發地起作用。天空中的閃電是自發地起作用的，電燈里的電就是聽從人的指揮發生作用的。但如果你違反了電的自然規律，就是已被掌握^的電，仍然會違反人的意志，燒死人，燒掉房子。價值規律也是如此。現在我們已經基本上能夠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使價值規律聽從我們的指揮，這是我們主動地遵守了價值規律的結果；而不是說我們可以任意違反價值規律，也不是說價值規律已經不再發生作用。

當然，我們也不贊成對價值規律的作用作過高的估計。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上，如果認為上述三種交換都是完整的商品交換，沒有必要加以區別，也是不妥當的。在三種交換中，只有第一種交換（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的交換）是比較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換，第二種、特別是第三種交換已經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換了，但仍然基本上或部分地保存着商品交換的性質。就連第一種商品交換，也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而是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了。由於三種商品交換性質上有差別，所以雖然都要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但其目的不同。在第一種場合，等價交換是為鼓勵集體所有制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第二種場合，是為正確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第三種場合，是為保證生產中消耗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能夠得到補償。這三者是顯然不同的。

在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上，如果無限制地利用價值規律來調節生產，調節消費品的銷售，而否認國家計劃的作用，象現代修正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這顯然是十分錯誤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各種重要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必須用國家計劃來調節；當然國家在調節生產和流通的時候，仍然必須掌握正確的價格政策。對各種次要的產品，如果不可能通過國家計劃來調節，也可以由國營商業機關通過供銷關係來進行調節，即通過國營商業機關的供銷計劃，通過國營商業機關同各生產單位所訂立的加工訂貨合同，通過某些消費品的定量供應制度，在必要時並以調整價格作為輔助的手段。國家既不應當不考慮價值規律的作用，任意違反等價交換的原則；也不應當濫用價值規律來調節各種產品的生產和流通，更不應當拋棄了國家計劃而依靠價值規律來進行調節。

在目前，我國的經濟科學工作者對於商品和價值規律等範疇，還存在着不同的認識，其中有些爭論僅僅是概念的爭論，而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我認為，單純概念的爭論是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為着避免卷入概念的爭論，我把問題的實質——例如幾種不同性質的交換，價格政策的幾種具體運用等——提出來，並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至於如何用商品和價值規律等範疇來說明這些問題，我說得很不完全，而且也不一定能夠令人信服，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討論。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問題

★ 翦伯贊 ★

一 古与今的問題

在过去的历史教学中，許多人过分強調古代史的重要性，甚至对古代史发生迷信，認為这是一个史学家必須通过的炼獄，至于近代現代史則不值一顧。一直到整风运动以前，还有一些史学家“禹行而舜趋”，“呼先王以欺愚者”。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是中国資产階級历史学的特点。我們反对了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并且针对这种情形，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方針，这是必要的。

厚今薄古的方針提出以后，在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引起了广泛的討論，在討論中揭发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十分严重的。有些高等学校在七門中国史必修課中有五門是古代史。在十一門选修課和加修課中，只有兩門是近代現代史。面对这样的事实，大家都認為厚今薄古方針的提出是及时的，必要的。但是对于厚今薄古这个方針的理解还是有些問題。

照我个人的看法，古今厚薄問題不是什么別的問題，它是史学家对待现实問題

的态度在历史学上的反映，是隱蔽在历史学中的史学家的政治倾向性和階級意識的表現形式，而古今厚薄的分歧則是历史学上两条路綫的斗争。然而現在有不少的人把厚今薄古当作分量問題或先后問題。

有些高等学校过多地削減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比重，个别学校削減到百分之三十。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最大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五，沒有达到百分之五十的。中学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些省市新編的初中历史課本，把一年講完的古代史，压缩在一学期講完。小学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种情况說明了有些人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压缩古代史的分量問題。

我以为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分量問題是不对的。就历史学方面來說，厚今薄古只是說要以更多的力量，更大的注意来加强近代現代史的研究，并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好好地研究古代史。它並沒有反对古代史本身的意思，它所反对的只是过分強調古代史和为古而古、頌古非今的那种資产階



級历史学的傾向。这是一个思想問題，不是多少的問題。

只要历史学家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了資產階級反动的历史观点，建立无产階級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觀，抱着古为今用的目的去研究古代或传授古代史，这并不算厚古薄今。反之，如果思想問題沒有解决，口里講近代現代，心里想的是古代，厚今薄古的問題还是沒有解决。

應該着重講授近代現代史，这不仅因为近代現代史具有比古代史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史，更重要的是近代現代史是我們当前的历史和接近我們当前的历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但是历史是一种貫通古今的學問，为了更深入地闡明近代現代史，必須在通史中給古代史以适当的篇幅，讓学生能够知道我們的历史是通过了一些怎样迂迴曲折的进程走到現在的。

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都沒有象中国这样保存了将近三千年的完整的編年史和历史人物傳記。我們既然保存了世界稀有的完整的古代編年史，为什么不进行認真的科学研究呢？只要我們方向正确，进行認真的科学研究，可以断言，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将作出一定的貢獻。

中国的古代史，并不是研究得太好，而是太差。一般地說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只有殷周史和近代史作过一些馬克思主义

的專門研究。自殷周以后至鴉片战争以前，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还需要大大地努力进行深入的專門的研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写出一些断代的专史，如秦汉史、魏晉南北朝史等等。然后在这些专史的基础上进行綜合的研究，写出中国原始社会史、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綜合研究，才能写出一部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中國通史。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专史，如土地制度史、手工业发展史、商业交通史、城市发展史、法制史、文化思想和艺术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都要写出专史来。不完成这些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就想大笔一揮在中国史上划出一条階級斗争和生产发展的紅綫，那是办不到的。

当然这不是說，我們在历史教学中就不應該貫徹略古詳今的精神。略古詳今是應該的，問題就是詳略的程度，要有个限度。这个限度的大小，可以規定一个大概的比例，但不應該任意規定，而應該决定于历史的内容。古代史可以从略，但應該略其所当略，不能因为要符合于比例而略去不应略去的部分，略得太多就会使学生在古代史方面得不到基本的甚至是起碼的知識。在另一方面，近代和現代史可以詳細一些，也應該詳其所当詳，不應該为了湊足比例而把不必要的史实硬塞进去，如果过分的繁蕪就会把学生引进鬧市，其結果是使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



貫徹略古詳今的方法也值得研究。合理的办法是逐步加詳。例如中国猿人可以少講一点，殷周就要詳一点，秦汉又要比殷周詳一点。这样从古到今，从略到詳。当然这不是說后一时期必須比前一时期詳細一些，假如后一时期沒有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比前一时期簡略一些。但一般說来，历史的内容总是愈到后来愈复杂，因而逐步加詳是合理的。但是我們現在不是逐步加詳，而是突然加詳。好象鴉片战争的前一天都不重要，可以从略，鴉片战争一开炮，历史就重要了，就要加詳。因而鴉片战争的前几年，可以用几百字交代，一到鴉片战争的那年，就是洋洋数万言。这种突然加詳，直綫上升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关于这一点，應該向司馬迁学习。司馬迁写史記，就是用逐步加詳的办法来貫徹略古詳今的精神。他写五帝則共为一个本紀，写夏、殷、周則各为一个本紀，写到了秦汉，則每一个帝王一个本紀。作表也是一样，对三代只作世表，对六国、汉兴以来諸侯王、功臣以及将相名臣，則作年表，对楚汉之际則作月表。

另一种情况是把厚今薄古当作先后問題，即用先后来表示厚薄。有些高等学校，先教現代史，再教近代史，最后才教古代史。这种先今后古的办法，对于那些具备了通史知識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是可以采取的，因为他們可以从近代現代史找到打开古代史大門的鑰匙；但是如果采取这样的办法講授通史，却是值得研究的。因

为通史的目的，是要使学生得到一种貫通古今的基本历史概念，它不仅要闡明每一历史阶段自己发展的过程，及其所独有的历史特征，而且要闡明从一个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例如講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或者講述从封建社会到資本主义社会，都必須按照历史发展的順序才能闡明。因为“所謂历史发展，最后的形态总是把过去的形态看成是向自己发展的步驟”^①，前一历史阶段中孕育着后一历史阶段的因素，在后一历史阶段中残存着前一历史阶段的断片，不了解前一历史阶段，对于后一历史阶段就无法說明。

在講授历史的时候，貫徹古为今用的精神是对的，但如果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那是錯誤的。例如把古代农村公社和我們現在的人民公社类比，又如把明代在朝鮮进行的抗击倭寇的战争和解放后的抗美援朝类比，这都是不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必然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性質，我們不應該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們本質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現在。

古为今用，不是历史类比，而是要求教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方法总结历史上各种有用的經驗，如生产劳动的經驗、阶级斗争的經驗以及抵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的經驗，用这些經驗来进行生产

①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經济学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8頁。



劳动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总而言之，厚今薄古的问题，既不能用过多地压缩古代史的办法来求得解决，也不能用先今后古的办法求得解决。思想问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即必须在广大的历史学工作者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这样做，就不能从

思想上解决厚今薄古的问题。列宁说过：“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①列宁的这几句话，对历史学也是适用的。为了从思想上解决厚今薄古的问题，必须做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的信徒。

二 历史的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问题

过去在历史教学中，过多地或者不恰当地强调了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讲得不够，对于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讲得更不够。这种现象，已经受到批判。但在目前历史教学中又出现了一种避免提到个别历史人物的现象。有些教师把商鞅变法改为秦国变法。凡是讲到汉高祖的地方，都用“汉初”二字代替他的名字。讲林则徐焚毁鸦片，也认为可以不提林则徐的名字。甚至讲儒家学说，有人不提孔子。在世界史讲授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个别的教师把亚历山大东征改为马其顿东征，把革拉哥兄弟的改革，改为农民为保持土地而斗争。理由都是一样，即认为上述历史事件和学术思想，都是历史的必然性或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所引出的结果，和个别历史人物没有任何关系。

着重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对的，因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过程揭示它的客观规律性，或整

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实现出来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历史就会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②

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其中也包括有象起初领导运动的人们的性格那样的‘偶然’情况。”^③列宁也说过，“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④因此，全部否定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而把经济规律性或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偶像化，这是错误的。如果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说成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4页。

②③ 马克思：“致留·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5页。

④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9页。



是和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而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必然性的结果，或者用历史必然性解释一切历史问题，那就正象恩格斯所说的：“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①

过分地强调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以至把他们说成是不受历史规律的支配，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胡说。但是如果不承认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乃至避免提到个别历史人物的名字，也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全面地讲述历史，应该是在肯定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下，承认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因此在讲述历史时，就不必避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名字，包括帝王将相在内。

避免讲孔子，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黑格尔也是一个大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却公然承认他是这个大思想家的门人。避免讲汉高祖，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帝王；拿破仑也是一个帝王，恩格斯却认为他是被战争弄得疲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不讲商鞅，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将相；俾斯麦也是将相，而恩格斯却恰如其分地肯定了这位有丰富的、实际的阅历而又非常狡猾的人物，实行了和普鲁士希望一致的民族统一。林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解放黑奴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是马克思却说“他是具有伟大成就而又心地善良的出类

拔萃的人物之一”^②。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但因为他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同情，以毫不掩饰的赞赏去述说他的政治死敌——圣玛利修道院街的共和主义英雄们，而恩格斯就称赞他是“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③。

历史人物是可以讲的，因为遮蔽人们的眼睛，让人们看不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不是历史人物本身，而是历史学家过分重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清除这种思想，即使不讲个别历史人物，也不一定就能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问题不在于讲不讲个别历史人物，而在于如何讲法。假如我们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讲述个别历史人物，那就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他们“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④用这样的观点讲述历史人物，则不但不会妨碍阐明历史规律，而且还可以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反映出他们生存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若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89页。

②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3页。

③ 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初版序第5页。



于情况，有助于历史规律性的阐明。只要我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古人，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物是可以講和應該講的。领导农民去轟击封建統治階級的农民革命領袖，和英勇地保卫祖国的独立，击退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們固然應該講，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作出出色的貢獻，并且因为他們的貢獻而加速了我国历史的进程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應該講。就是帝王将相也不应一概抹煞，秦始皇、汉武帝固然要講，就是李后主、宋徽宗，也不能从文学艺术史上抹去他們的名字。妇女也不要除外。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妇女，例如續成“汉書”的班昭，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的完成者；宋代的女詞人李清照，也應該被認為是文学史上的一顆珍珠。此外，如象王昭君、烏孙公主、文成公主等，也不能抹煞她們在汉唐时代的民族友好关系上所起的一定的作用。

坏人也要講，因为他們曾經起过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

总之，在講授历史的时候，應該着重地講述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經济发展的規律性，和人民群众的創造作用，也要講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

和历史学恰恰相反，过去的考古学只是講古物的形制花文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相互比較，确定古物的年代，因此在考古学的教学中，主要的是講器物排队，学生所接触的是石器銅器陶罐等等，从来看不見人。

研究古器物的形制是重要的，但不論怎样重要，也只是考古学的手段，不是目的。考古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古器物來說明这些器物制作者和所有者的生存时代的社会关系，亦即要发现隱藏在这些古器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最后发现階級与階級的关系。

从古器物中寻找人与人、階級与階級的关系是困难的。例如我們曾經发现古代的谷物，其中有小麦，但正象馬克思所說的：“小麦的滋味不能告訴你，它是誰栽种的；同样我們研究这个过程的时候，也不能看見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管理人的残酷的鞭下么？在資本家的注意的眼下么？是象辛辛苦达在他的小田園内生产一样么？是象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一样么？”^①

和小麦一样，其他出土的古器物，都不能告訴我們上面所說的情况，然而我們的目的却是要知道上面所說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可以找出来的。考古学家如果注意那些和罐罐罐罐一同出土的生产工具，就有可能发现人与人、階級与階級的关系。因为这些生产工具都表現着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用馬克思的話說，它們“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測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②

現在考古学的講授又有些相反的情况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0頁。

② 同上書，第195頁。



况，好象考古学要离开物的研究来講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考古学上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与物結合着作为物而出

現的，换言之，是物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考古学应当努力要通过古器物找到人与人的关系。

三 統治階級与人民群众問題

旧的历史学，都貫徹着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統主义历史观，因而它的内容主要地是写統治階級方面的活动。如果也提到人民群众，那是被当作历史上的消极的、被动的因素。

解放以来，許多历史教师已經承認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历史观，但由于传统的影响，个别的教师有时还是过多地不适当地講述統治階級的活动。例如有一位教师把朱元璋說成人民的皇帝，因而使学生对朱元璋发生了衷心的崇拜，大作“洪武頌”。有些教师对宮廷生活很感兴趣，在講述安史之乱的时候，不着重分析这个变乱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它所引起的后果，却大講唐玄宗的宮廷生活，引导学生去欣赏霓裳羽衣之曲。这种講法当然是不对的。

为了清除封建正統主义历史观，現在也有个别的教师避免講述統治階級的活动，乃至避免提到他們的名字。例如个别的教师講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煬帝修运河的时候，既不提秦始皇、汉武帝、隋煬帝的名字，甚至也不講秦王朝、汉王朝、隋王朝，而用几十万或几百万劳动人民代替这些皇帝的名字和王朝。我以为这样的講法也是不妥当的。誠然，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

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沒有挑土，汉武帝沒有筑堤，隋煬帝沒有挖河，但是他們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組織者，不承認他們动员和組織工作的作用是不对的。馬克思在說到亚洲各国巨大建筑和公共工程时曾經引用了这样一段話：“那种种令人惊异不置的遺蹟所以能够发生，就因为該帝国的君主和教主，对于这大群人有指揮的权力。”^①中国沒有教主，具有指揮权力的就是君主，而君主之所以具有指揮的权力，就是因为他們在封建地主制度的基础上掌握了劳动人民赖以生活的資料。

不仅公共工程如此。在以往的階級社会中，劳动人民从事任何劳动生产，都必須以各种被奴役被剝削的身分参加到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去，在他們的对面是各种各样的剝削階級。这些剝削階級掌握着当时的社会經济命脉、政治权力，强制劳动人民按照他們的意图去实现那些对于他們說来是必要的劳动創造。因此在講到階級社会的劳动生产时，就不能不講到当时統治階級的意图以及为了实现他們的意图而作出的具体措施。不講这些，就不能說明劳动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0頁。



人民是在怎样的关系之下来参加劳动生产的，亦即不能说明劳动生产中的剥削和被剥削、强制和被强制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阶级斗争的最基本的原因。

在讲述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也有人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的改革，例如王莽改制都可以不讲。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王莽改制是为了缓和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但是他的王田、奴婢、五均、六筭政策，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才爆发了赤眉、铜马、新市、平林的农民起义。不讲王莽改制，就不能说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

还有人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如汉朝的七国之变，晋朝的八王之乱也可以不讲，因为这些变乱，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我以为这也是不妥当的。西汉的七国之变，西晋的八王之乱，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它们都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当时历史的主要内容的一个方面，怎么能不讲呢？不但七国之变、八王之乱要讲，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倾轧、宫廷政变也要讲。因为这些事变往往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格斗，而是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直接间接影响当时人民的生活，甚至引发敌对阶级间或民族之间的矛盾，例如八王之乱引起了西晋末年普遍发生的流人暴动，同时，替“五胡十六国”的局面铺平

了道路。

在文化思想领域内的进步和落后、反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贯通古今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深刻最原则性的表现形式。它不仅被动地反映阶级意识，并且往往被用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既然是斗争，就不能只讲斗争的一个方面，也要讲斗争的另一个方面，比如不能说只讲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要讲唯心主义的思想家。

由于统治阶级统治了物质生产资料和人，因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它同时也就是该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就拥有精神生产资料，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要听命于这个阶级。”^①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凡是和这种正统思想对立的思想都被指为异端。当我们讲述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的时候，要讲述这种被指为异端的思想，也要讲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阐明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转引自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98页。



总之，阶级社会的历史总是有敌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活动，阶级社会就由这敌对的两个阶级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去掉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全面地说明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在我们讲授历史的时候，固然要着重讲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但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就必须无情地揭露人民群众的敌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用不同的形式剥削压迫人民的史实，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才能显示出人民群众的每一步前进都是残酷斗争的果实。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阶级社会的历史写

成漆黑一团，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恩格斯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者把中世纪的历史当作历史行程中由千年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中断，而忽视中世纪所作的巨大成就，是“没有对事物的历史观点”。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发明都是生长在阶级社会中的发明家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此，当我们讲阶级社会的历史时，要指出它的黑暗面，也要指出它的光明面。

四 理论与资料问题

过去在历史教学中，有一种过分强调史料的倾向，有些教师把占有史料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而以拾遗补缺作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甚至认为史料就是史学。由于过分强调史料，有些教师在讲稿中大量堆积史料，而没有进行应有的理论分析。科学研究也是侧重繁瑣考据。往往为了一些不关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或问题的考证而搜罗摘抉，穷幽极微。例如有一位教师就考证过帽子和雨伞。对于重大的历史问题，反而轻描淡写，不予重视。象这样的史学家就正象章实斋所说的：“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①

我们反对了把史料当作史学的说法，

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史料本身。现在有个别教师对史料不够重视。他们为了避免陷于繁琐主义，在讲授历史的时候，不根据具体的史实分析历史问题，只是空空洞洞地讲一些原理原则，或者干巴巴地讲一些发展规律，一再重复人所共知的道理。有些教师虽然也选择了一些史料，但并不是用原理原则来分析史料，而是把史料当作事例来注释原理原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任何事情比玩弄个别事例更容易的，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史料如果不被放在它的整体中，放在联系中，那它们就是一些孤立的历史碎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篇。



片，任何問題也不能說明。

有些青年，也有輕視史料的情況，他們只滿足于一般的理論原則，而不去鑽研具體的歷史資料。但是恩格斯却反對這樣做，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經批評過當時的德國青年作家。他說：“一般說來，對於德國許多青年作家，‘唯物主義的’這個形容詞不過是一個套語，他們用這個套語去處理各種事物，再也不花什麼氣力去作進一步研究，也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籤貼上去，就以為一切都解決了。然而，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一個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種用以按黑格爾學派方式構造體系的手段。全部歷史都應該開始重新研究。……這領域極為廣大，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有很多的創造、獲得卓著的成績。”^①

不重視史料，或者企圖不通過史料的分析來說明歷史，是不對的。研究歷史必須從實在的具體的史實出發，不能從空話出發。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這句話是對的。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反對史料，而且十分重視史料。馬克思不止一次告訴我們，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資料，不占有資料，分析資料，便不能對於現實的運動作出適當的說明。他曾經嘲笑那些輕視資料的人，說他們“認為知識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自然不需要這種努力。他們這些幸運兒為什麼要為一些經濟學的和歷史的材料自尋

苦惱呢！”^② 恩格斯也曾經說過：“即令只要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揮唯物主義觀點，也是一種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講空話是無濟于事的，這樣的任務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審查了的、完全領會了的歷史材料才可解決。”^③ 毛澤東同志也曾經教導我們要我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不在於史料本身，而是在於用什麼觀點和方法來對待史料。如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運用史料，則史料愈豐富愈好，史料愈豐富，得出的結論就愈益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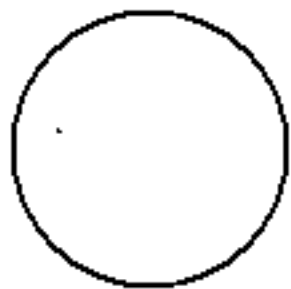
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論。不用正確的理論來分析研究，史料等於廢物。因為歷史學的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樣，“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那必須用抽象力代替二者。”^④ 要具有這種抽象力，即理論分析的能力，就必須學習理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現在我國歷史學教師都在學習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87頁。

② 馬克思：“給魏德邁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頁。

③ 恩格斯“論卡爾·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4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7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初版序第2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是我們還是學得非常不夠，這主要地表現在我們還沒有學會怎樣應用理論去分析具體歷史問題，因而在講授歷史的時候，理論與資料不能很好地結合，不能把理論貫串在史料之中。只要碰到具體的歷史問題，理論和史料就分了家，史料歸史料，理論歸理論，分道揚鑣，各不相關。因此對於歷史學教師來說，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加強理論的學習。要學好理論，當然要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且通過史料的分析，練習理論的運用。更好的辦法是通過百家爭鳴的辦法提出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事件或人物展開爭論，只有在學術的論爭中，才特別感到理論的重要，也特別感到資料和理論相結合的重要。

理論總是帶有普遍性、一般性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有替中國史上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事件或人物準備現成的結論，

就是毛澤東同志也只是教導我們怎樣研究歷史。因此要想對於中國史上的每一個具體的歷史問題、事件或人物都能找到現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論，那是沒有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認真地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對於歷史學上的一些問題、事件或人物作出創造性的概括或判斷。

馮援為孟嘗君收債，問孟嘗君說：“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說：“視吾家所寡有者。”我們的史學家，最好也檢查一下，自己缺少什麼，是理論、還是史料，然後補充自己所缺少的東西。我以為，對於許多人來說，最“寡有者”還是理論。因此，我們全國的歷史學教師都應該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歷史教學的水平。

編者的話

薛暮橋同志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和翦伯贊同志的“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兩篇文章，分別談到了目前經濟學界和歷史學界所討論的一些重要問題，我們發表出來，供大家討論。



为了追求真理

· 施东向 ·

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对于同一个问题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是常有的事情。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客观真理。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平坦的；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从来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

前人在科学研究中所达到的正确的结论，当然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重复前人的结论，而是要在前人所未有或不可能接触到的领域内，在前人所未有做出正确的或完全正确的结论的问题上求得真理。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前人提出的正确的结论可以对我们起引导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而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做艰苦的努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必须依靠的指南针；依靠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不犯大的方向错误，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真理。但是有了这个指南针，并不能使我们在还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上不费吹灰之力而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就是人们确实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向前摸索真理，也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要在任何科学问题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详尽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越是复杂的问题上，就越是需要穷年累月的努力，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但是经过努力而仍然得出错误的或部分错误的结论的情形也是可能的。

对于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没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真研究的功夫，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真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科学史证明，在科学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结论的人固然是有功劳的，而那些勇于在新的科学问题上进行试探，提出终于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了的假设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功劳的。各种假设，各种不成熟的见解，各种带有片面性的主张的相互争辩，这对于达到正确的全面的结论，往往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坚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的百家争鸣。



毛澤东同志說：“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

我們的共同目的是追求真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学术問題上展开充分自由的討論。我反对你的意見，但是尊重你的发言权，这是在我們的学术討論中所应当有的态度。当然，为了辨清是非，尖銳的批評有时是必要的；但是人們都应当采取說理的态度，努力用科学的論証來說明是非。

参加学术討論的人，都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我們的社会，是真理能够开花結果的社会。但是有人却会因为自己的意見不被多数人贊同而动摇。如果自己的意見确是有錯誤，以至不被人贊同，那就应当修正自己的意見。但如果是正确的意見，即使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二人同意，也应当坚持。在学术討論中，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而在少数人的手里。当然，只要的确是真理，那么少数人的意見也一定会慢慢地变成多数人的意見。

我們在有勇气坚持真理的同时，又必須有虛怀若谷的态度，要能够向一切人，包括向自己的爭論对手学习，接受別人的正确意見，修正自己的錯誤。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人就会随波逐流，沒有主张。不虛心听取別人意見的人就会自以为是，坚持錯誤。这两种态度都是应当反对的。科学本身是老老实实的學問，它要求人們以

老实的态度对待它。討論的双方既然都是为了探求真理，发展科学，那么把对手那里正确的見解接受过来糾正或补充自己的見解，又有什么不好呢？

学术討論，是长期或短期研究成果的展覽和比賽。有些討論，半途擱淺，无法深入，这种情形正是反映了在所討論的問題上，大家还缺乏比較深入的研究。比較复杂的艰难的問題也往往不是一次討論所能够完全解决的。經過一次討論以后，虽然問題还没有解决，但是問題的症結可能暴露出来，我們自己之所以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弱点也可能暴露出来。这都是很有好处的。这就会促使我們更好地、更有目的地进行研究工作，努力去收集我們所必須具备的資料，去掌握我們所还缺乏的知識，去解决阻挠我們前进的疑难。这样，我們就能使討論一步步深入，使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一步步提高。浅尝即止，对于科学事业是永远不会有益处的。

学术工作者应当勇于参加热烈的爭論，也要甘于“寂寞地”进行切切实实的研究工作。不然，就容易形成“赶浪头”的現象。有一个寓言里說：有个木偶，听说海里有数不尽的珍宝奇麗，宛若仙境，于是便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旅行。但当它在海面上飄浮很長的时间以后，却大失所望，因为他所看到的大海，除了一片汪洋以外，一无所有。我們最好不要做这个木偶，要获得“宝藏”，就得在真理的海洋里深入下去！



关于水电和火电問題的討論

李 銳

多发展水电还是多发展火电？这是长久以来頗有爭論的一个問題。

水电和火电是各有利弊的，在电力生产上是相輔相成的。一般說来，火电的特点是：造价低；建設時間短，又便于扩建；易于靠近用戶；年利用小时高；但是消耗煤炭多，運轉人員多，成本高；本身是个大用戶，即厂用电約占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到八；運轉时启动慢，較易发生事故；設備制造耗用鋼材多，需要很多優質合金鋼；配套很复杂；基本建設用的鋼材也比較多。水电正大体相反：造价高；建設時間长；不能隨便靠近用戶；年利用小时比較低；枯水时电量要减少；但是成本低，只及火电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運轉人員也只有火电的十分之一；本身用电只占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一；運轉时启动灵活，很少发生事故；設備制造用的鋼材少，基本上不需要優質鋼材，有些部件还可用鑄鐵代鋼，配套也簡單得多，基本建設用的鋼材也比較少。

十年以来，我国电力工业的建設一直

是以火电为主、水电为輔的，水电的投資只占电力投資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現在火电占我国电力的四分之三以上，而且为了适应緊迫的用电需要，当前的电力建設仍然必須以火电为主。在今后两三年內，这一形势大体上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十年来形成火主水輔的根本原因，乃是用电急迫，而每年投資有限，必須將資金用于收效快的火电。但是，我国水电的发展，必然要随着国民經济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我国国民經济愈发展，愈需要大量的电力，大量的水电。另一方面，国家經济愈发展，也就愈有力量办水电；同时，我国丰富的水力資源是大量发展水电的有利条件。因此从长远說来，实行水电为主、火电为輔的方針，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是需要和可能的，当然，这个方針不是短期內能够实现的。

通过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水电建設的实际情况，对于我国水力資源特別优越的条件，大家有了更明确的認識；同时，水利工程必須和水电緊密結合，耗电工业的



发展有賴于水电的发展，水电設備国内便于制造，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也越来越清楚了。

現在将四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分別說明如下：

首先，最主要之点是：我国水力資源极其丰富，开发条件特別优越，利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水电。

动力資源的条件，是影响世界各国水电和火电比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現在世界的总发电量中，水电約占三分之一。以水电为主的国家是不少的。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朝鮮、新西兰、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水电占到全部电力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有的国家甚至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国家水电之所以占了絕對优势，就是由于一方面水力資源比較丰富；另一方面又十分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动力資源。这些国家最好利用的水力資源，已經大部分得到了开发。

美国的水电比重长期停留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主要是由于煤炭、石油、天然气資源特別丰富，便于发展火电；同时，煤炭、石油、鐵路資本家和农場主等，对发展水电也常有阻碍。但是从絕對数量說，美国拥有的水电容量，現在仍然是世界各国最多的，达二千七百万瓩。美

国的水力資源已經开发的約占全部蘊藏量的百分之二十七。

从动力資源來說，我国的水力資源和煤炭資源都是十分丰富的，因而在水电和火电之間，可以有較大的选择余地。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資源还在勘察之中，目前还不能作为发展火电的根据。在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內，我国火电的发展主要还是靠煤炭。

煤炭是一种重要的物資。它是冶金等重工业不可缺少的燃料，又是一种珍貴的化工原料，将来会逐渐成为解决人民吃穿問題的重要資源。因此，我們应当逐步改变用过多的好煤来发电的不合理的情况，逐步地用更多的劣質煤和洗煤用的泥煤来发电，使今后火电的发展更合乎經濟和合理的原则。

火电的发展决定于煤炭的供应。一百万瓩火电設備的生产，每年大約需要四百五十万吨左右原煤，运输問題是一个很大的問題。我国煤炭資源的分布，北方多于南方，煤炭生产也受到很大的地区限制。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用煤要靠华北、东北两地区供应，形成了大量北煤南調和长距离运煤的現象，而煤炭长途运输的浪费是很大的。

在一九五八年，探明了的煤炭資源的蘊藏量有极大的增加，长江以南各省也探明了不少煤炭資源。煤炭工业部門正在努力改变产煤地区分布不合理的情况，准备在南方增建新的煤炭基地，爭取各区用煤



能够逐步基本自給。但是这一努力还不是很快就能見效的。今后即使做到各地区用煤基本自給，但是在地区内部，仍然有相当的运输問題。

我国水力資源占世界第一位。根据这几年进一步的調查，按平均流量共蘊藏五亿八千万瓩，加上小河流的資源，当在六亿瓩以上。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沿海各省的潮汐水力。

更重要的是，在地理位置和地形两个方面，我国水力資源有特別好的开发条件。

在地理位置方面，水力資源分布在全国各地，絕大部分工业城市都可以从水电站取得电力；估計在相当长的時間内，只有个别水电站的輸电距离需要达到五百公里。将来修建长江三峡水电站时，送电一千公里的問題才会提到日程上来。

在地形方面，我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高原、台地、山脉和丘陵，河流穿过它們奔向盆地和平原，其間造成許多陡峻的坡降和狭窄的河谷。因而水电站的壩址随处可见，容易集中落差，縮小工程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我国的长江，河流长度相差不大，但每公里的平均落差，长江为密西西比河的十二倍半。

水电站的造价主要受自然条件的控制，往往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工期的长短同自然条件也有重要的关系。火电站的造价和工期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則較小，单位造价变化的幅度也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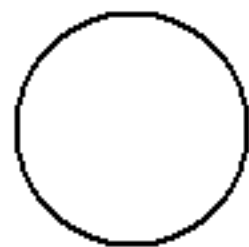
較小。

根据世界各国的經驗，造价高和工期长是水电建設的两个主要弱点。各国水电站每瓩的造价，一般为火电的两倍到四倍，甚至更大；工期也比火电长得多。

根据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經驗，我国水电的单位瓩平均造价只比火电高出十分之一，水电的平均施工期限也只比火电約长三分之一。

我国水电站造价低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条件好，工程量小。同国外許多主要水电站的情况对比，我国水电站每瓩的混凝土工程量，一般只及国外的一半或者不到一半。除此以外，我国水电站造价低，也还有以下的原因：一是土建工程单价低。水电站的投資中，土建工程約占三分之二。我国土石方工程的单位价格，如以鋼鉄价格为共同的基数，約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在混凝土工程和隧洞工程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二是施工准备工程簡單，特别是南方更便于因陋就簡。三是气候条件好，一年四季可以施工。再加上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使設計和施工往往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造价。

在工期方面，外国建設一个中型或大型水电站，总要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才建成的也不少見。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修建的五万瓩左右的中型水电站，自正式开工到第一台机組发电，一般約两年半；当时估計一个五十万到一百万瓩的水电站，工期在五年左右。这样的速度在



世界各国也算快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中型水电站的建設時間，已縮短到一年半左右，一般大型水电站也能縮短到三年左右建成。

新安江水电站装机容量为六十五万千瓦，是用“洋法”和“土法”相結合的办法施工的，开工以后不到三年就有可能发电。而美国哥伦比亚河上正在修建的普列斯脱滩水电站，規模同新安江相仿，施工是高度的机械化，在老板的巨額奖金和罰款的影响之下，預計仍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发电。

水电站的施工最适于洋土并举，特别是在开工的初期和在土石方的处理上，可以更多地采用土办法。一九五八年开工的大中型水电站項目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八倍，施工的洋設備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一方面說明了水电建設中施工設備的不足，但也可見土办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国，洋土并举是可以大大縮短工期的。当然，建設水电站一般工程量比較大，一定数量的洋設備仍是必需的。

根据上述动力資源，特别是水力資源的特殊有利情况，我們当然應該坚决执行又多又快而且能又好又省地发展水电的方针。

其次，积极开发水力資源，实现河流的綜合利用。

我国許多水力資源都具有巨大的綜合利用的作用。这些水力資源的开发，都能

同时滿足国家当前迫切的防洪、发电、灌溉、工业供水和航运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就可以用最經濟的投資取得国民經济各有关部門最大的綜合效益。綜合利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治理和开发河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則。

洪水灾害是我国广大土地上自古以来存在的問題，几乎全国所有主要河流的下游，都有輕重程度不同的洪水威胁。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大河的泛滥灾害，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河流，不仅洪水发生的次数十分頻繁，每次灾害所造成的損失也是十分巨大的。解放以来，我們在防洪工作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績，洪水灾害大大減輕了。譬如黄河在解放后十年內遭遇了四次洪水，一九五八年黄河下游发生接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都沒有发生决口。又如长江在一九五四年发生的洪水，比解放前一九三一年的洪水要大得多，但受灾情况却比一九三一年輕得多。当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些河流的洪水問題，仅仅依靠加强堤防等措施是不够的，还必须修建一些具有相当調节能力的大小水庫来削減洪峰。例如，經过丰满水庫的調节，曾将一九五三年松花江下游的最大洪峰一万五千秒公方減至七千三百秒公方，曾将一九五七年松花江下游的最大洪峰一万七千四百秒公方減至六千秒公方。这些水庫同水电站是一种孿生的关系。

我国河流开发的另一个重要問題是灌



溉。由于雨量分布得不均匀，往往不能及时保证农业生产的用水需要，几乎全国的各个地区，特别是西北和华北，都容易发生程度不同的旱灾。为了解决农业用水所修建的大小水库，也同样可以结合发电。

我国河流的航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许多河流上有险滩，枯水时更不便通航，需要对航道加以改善。水道运输是一种量大而价廉的运输方法。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航运的要求也正在日益增加。水电站的修建，在上游造成水流平缓的水库，在下游则增加枯水时期的流量，这对航运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当然，有的河流，在修建水电站时还必须同时修建通航设备。

工业给水也逐渐成为我国工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和其他许多轻重工业，在生产过程中都要耗用大量的水。火电厂在生产运行中也有很大的用水要求。水库和水电站的修建，可以担负起工业给水的任务。

此外，渔业生产的发展，也是河流综合开发中可以同时结合解决的问题。

水电站的建设同这些方面的关系，是互相结合又互相促进的。官厅、佛子岭、梅山、三门峡、丹江口、青铜峡、密云等工程，正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工程，即使不是为了发电，也是需要修建的。去年和今年各地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可以结合发电的就在二百万瓩左右。如果发电

设备能够赶上去，其中绝大部分都可以很快发电。

大家都知道，河流的综合利用为国民经济带来全面的长远的利益。与河流有关的各项国民经济利益，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和工业供水之间，对于河流的开发和水量的控制、使用，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分清主次，防止片面，使各种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使各项国民经济利益都能获得必要的、适当的满足，总的效益达到最大的限度，是必须从自然界的各种条件（包括水文、地形、地质等），从政治、经济和技术各个方面，从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分项具体计算、详细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之后，才能求得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水能利用问题，即水力发电问题，是河流综合利用中情况最复杂和联系最广的问题，因为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电力系统（与火电的配合）、同河流水文（洪水和枯水）以及同工程结构本身的布置，都有着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具有较大水库的水电站，是能够统一解决各种矛盾，合理地实现河流综合利用的要求的。

第三，耗电工业的发展，要求有廉价的电源——水电来配合。

所谓耗电工业，就是指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电能的工业。这种工业产品的制造，大都采用电炉冶炼或电解过程。在黑色冶金方面，主要是各种优质合金钢、铁合



金；有色冶金方面，主要是輕金屬系統的鋁、鎂、鈦以及電解銅；化學工業方面，主要是化學肥料和合成纖維。生產方法的改變也可以使某些普通工業改變成為耗電工業，如電爐煉鐵代替高爐煉鐵，電爐煉鋼代替平爐、轉爐煉鋼，用水電解法代替一般方法製造合成氨。耗電工業的產品是現代工業和現代國防不可缺少的。因此，耗電工業的發展水平成為一個國家工業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耗電工業的產品成本中，電費占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甚至高到百分之七十。這一類工業，世界各國大都靠水電來生產。加拿大、瑞典、挪威等國的煉鋁工業，從國外輸入原料，再向國外銷售產品，這就等於輸出了水電。一座十萬噸的煉鋁廠，大約需要三十萬到四十萬瓩的廉價電力，這只有大水電站才能勝任。因此，在我國大量發展成本低廉的水電，才能促進耗電工業的發展。反過來，耗電工業的發展可以最好地同水電相結合，能夠在短期內使水電站的全部容量充分發揮作用，並且可以設法利用水電站的季節性電能，即洪水和豐水時期的電能。

這裡順便提一下成本的問題。降低成本，積累資金，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遵循的經濟原則。不斷提高全國發電量中水電的比重，是降低電力成本最有效的一個措施；這對於降低各種用電產品的成本、加速國家資金的積累、乃至提高勞動生產率，都是有着重大意義的。

第四，水電設備比火電設備容易製造，容易得到發展。

這是由於水電設備在製造技術、金屬材料和配套設備三個方面，都比火電的要求低得多、少得多。以電站的主要設備來說，水電不需要複雜的鍋爐，也沒有高溫、高壓、高速的問題，材料上也就不需要優質合金鋼。水電設備所需的鋼材只及火電的一半，銅只及火電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而且絕大部分是用的普通鋼材；水頭不高的電站，有些部件還可以用鑄鐵，以至鋼筋混凝土代替鋼材。當前火電設備的一個難關是配套問題，這需要經過一個相當的時間和巨大的努力之後，才能逐漸得到解決。這方面，水電也簡單得多。因此，水電設備的製造比較容易推廣，一般機械製造部門都有條件來承擔。

綜上所述，從煤炭資源的情況，水力資源及其開發條件，防洪、灌溉等的綜合利用要求，耗電工業的發展，設備製造等這幾個方面來說，我國完全應當更多更快地發展水電，應當力爭在盡短的時間內，使水電趕上前去。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來看，算一算大賬，以水電為主、火電為輔作為電力建設的一個長遠方針，是完全合理的。

關於水電的好處，我國應當多發展水電，理論上一般是得到公認的。但在當前



水电发展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在認識上和措施上得到解决，对于贯彻水主火輔的方针是不利的。

当前使人們对于发展水电引起怀疑的一个問題，是关于水电站枯水年的問題。

去年东北丰满和四川獅子滩两水电站都碰上了枯水年，去冬今春发电量特別减少，因而引起了一些議論。現在将这件事作一个簡單的說明。

去年第四季度，正当东北严重缺电的时候，丰满出力大大降低，只能有一台机组經常运转。缺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电力赶不上大跃进的形式。而丰满第四季度的出力降低，则是由于遇上了特殊枯水年，几个矛盾碰在一起造成的。去年丰满的年总水量只有六十九亿公方，不及多年平均水量一百四十四亿公方的一半；这是丰满有水文記載三十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枯水，从水文上推算，是超过百年一遇的枯水。丰满水电站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东北电力系统中最主要的供电电源，仅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就供应了将近一百亿度的电量，为国家节省了七百四十万吨煤炭；由于丰满供应了大量廉价的动力，东北电力系统的电价在全国来说是最低的，这对东北地区电气冶金、电气化工等耗电大的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丰满水电站的设计中，曾考虑到遇上特殊枯水年时，最低发电量为十二亿度（设计中的多年平均

发电量为二十亿度）。这时就需要增加火电站的負担，动用电网中的备用容量，来补偿它少发的电量。去年四月初，中央气象台和丰满水电站曾經預測到要遇上枯水年，在水庫調度上本来应该早作准备。可是在四月至七月間，为了满足东北电力負荷的增长，尽管来水量已經大大减少，丰满还是比往年同期多发了二亿度电。因水量收支不能平衡，把水庫存水提前用掉，迫使丰满水位大大下降。到第四季度，来水更少，而且水头又很低，只能有一台机组經常运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一年，丰满仍勉为其难，发了十六亿度电，只比設計电量少发四亿度。去年四月至十一月間，东北电网的需电量增长百分之六十，而发电设备只增长百分之十三，这是缺电的最主要的原因。

獅子滩水电站去年也遇到了枯水年，約比平时少发电百分之二十六。可是，造成水庫水位过早下降，和今年三、四月間发电量严重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去年估計当年的雨量不会少，为了避免洪水期間弃水，再加上为了降低发电成本，重庆的火电厂曾部分停止生产（一直到八月才带滿負荷），讓獅子滩比原計劃多发了一千二百万度电。其后果是：提早用水一亿二千万公方，損失水头近四公尺，由于水头降低，損失的电量为六百三十万度。这时，獅子滩下游兩級新建的水电站——下碛和廻龙寨正在装机，还没有运行，因而发生了弃水，讓水不做工作，白白流走，共



損失電量一千八百多萬度。去年儘管獅子灘遇到枯水，重慶地區發電設備的增加趕不上電力負荷的上漲，但是在今年二月份以前，重慶地區的供電還是基本正常的。如果能夠按獅子灘原訂調度計劃正常運行，把去年早用掉的一億二千萬公方水留到今年来用（約可多发三千余萬度電），並且早一些動用電網內的火電後備，早一些調整負荷，就是遇到枯水年，重慶地區今年三、四月份的電力也是不致於這樣緊張的。

水電站確有一個枯水的問題。如果這個地區只有一個孤立的水電站，或者是純粹靠天然流量沒有水庫調節的水電站，那麼，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如果水電站不是孤立的，電網之內還有其他水、火電站，有備用的容量，有水庫調節流量，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河流的水文情況，有豐、有枯，這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有它一定的規律。只要我們認識到這種規律，並且設法掌握和駕馭它，就不會造成大的困難或者損失。

丰满和獅子灘都是多年調節的水庫，可以對年與年之間的水量進行調節。去年兩地的來水量都比平水年少百分之五十，而由於動用了前年的存水，實際上少發的電量只是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六。因此，應當反過來說，這是具有多年調節水庫的水電站的一種優點。當然，動用存水，要用得恰當，不到最緊急的時候不要去輕易動用。關於水庫的調度，一方面要求在豐水期多得電能，少棄水；另一方面又要

求在枯水期保證一定的出力，以滿足用戶需要。我們應當從去年的水庫調度和水火電站的配合上吸取教訓。

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等以水電為主的國家，當然遇到過多次枯水，一般都是通過水火電合理調度和動用系統中原有的備用容量得到解決。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發生枯水而使水電建設的發展受到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在繼續大力發展水電。

不論水電為主或者火電為主的國家，電力系統中都需要一定的備用容量，以便在定期檢修、發生事故和負荷發生意外上漲的時候，不致影響正常供電。在特殊枯水年，就能利用這種備用容量以補不足。

我國在自然條件上同上述國家有所差別：我國國土廣大，氣候複雜，一年四季都有降水，各條河流的水文情況很不相同。去年東北松花江上游和鴨綠江遇到特殊枯水，而黑龍江卻遇到特大洪水；四川獅子灘遇到枯水年，而附近的大洪河卻是個豐水年。將來水電站修多了，電力系統也有了大的發展，相鄰河流的水電站豐枯水量互補盈虧，水火電配合運行，即使有的水電站遇到枯水，困難也是比較容易克服的。

當前有關發展水電的第二個突出問題，是關於裝機容量和發電量的平衡問題。

目前容量和電量都感不足，而電量的



不足，更成为主要的問題。有的水电站利用小时数較少，比同一装机容量的火电站，发电量要少得多。因而建設一个同样装机容量的电站，为了多得电量，在当前这样大跃进的时候，許多地方宁願多要火电，不要水电。并有所謂“两个瓩（水电）不頂一个瓩（火电）”的說法。

一个水电站装多少容量，平均年利用小时多少，是由它本身的条件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的。一般說，在一个以火电为主的系統内水火电站配合供电时，常由火电站担负一天二十四小时内比較稳定的用电要求（基本負荷），而由水电站担负一天内变化較大的用电要求（尖峰負荷）。例如，官厅水电站在京津唐电力系統中，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担任基本負荷的火电站相比，水电站的年发电量即年利用小时就少得多，这样的配合是經濟而又合理的。如果系統中沒有水电站，而以同样容量的火电站担负尖峰負荷，不仅它的发电量和利用小时也会同水电站一样小，而且在运行技术上要比水电站增加許多困难。此外，水电站的装机容量稍多一些，还可以利用洪水期的水量，多发出一些电量，节省煤炭。这个优点是火电站所沒有的。

在以水电为主的国家中，作为供电主要电源的水电站，其利用小时数是相当高的，一般达到五千小时以上。因为它既要担负尖峰負荷，同时也要担负基本負荷。在以火电为主的国家中，情况正好相反，

作为輔助电源的水电站，其年利用小时数可能低到二千小时。这些水电站，一方面主要是担负系統中的尖峰負荷；另一方面在遇到有发生事故的危險时，也可作为备用容量之用。

我国今后总的情况，水电要逐漸增多，所以水电站的平均利用小时数不宜过低（也就是装机容量不宜过大）。但就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在某些水电較少，而火电較多的地区，水电站利用小时数稍小一些，装机容量稍大一些，也还是合理的。

对于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平衡問題，还要从下列三方面来認識。一是为了适应当前国家建設的发展对电力的急迫需要，虽然火电設備的制造要消耗更多的鋼鉄和有色金屬，但是仍然必須大力发展火电設備的制造。二是对水电的电量要認真算清楚，不要偏少，当然也不要偏多。三是水电建設時間虽然比較长，初期投資也比較大，但是为了逐步增加水电的比重，在今后长期得到廉价电力的好处，就需要在安排电力建設計劃的时候，对这一情况予以必要的照顧。

在具体措施方面，水电站机組安裝的进度，应当更好地与电量的需要相适应。在目前情况下，有的新建成的水电站，机組可以分期安裝，以緩和設備供应的紧张。这样，已經安裝的水电設備，可以开始发电，同时，又为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



当前有关发展水电的第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水电站同工业布局如何更好配合的问题。

现在有的地方，工业发展快，电站建设慢了；也有的地方，电站建设很快，土建工程已完成，设备也将交货，可是电力用户却没有能跟上去；也有的地方，本来已经严重缺电了，反而又增加了一些耗电大的工业，使缺电更加严重。这当然不仅仅是水电的问题，而是水、火电共同的问题。但是由于水电的建设时间究竟要长些，建设地点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更大些，在适应工业布局的变化上，困难也就比火电多。

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发生过。工业布局和水电配合不好的情况，是应当也是可能加以改善的。有许多工业的布置，主要决定于资源、运输、场地、供水等条件，用电关系较小，当然不能强调要它们来迁就水电。但是对于某些耗电大的工业，供电问题是这些工业选厂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尽可能地更多地迁就水电是有必要的。当然在规划水电电源的时候，也应当主动研究如何同这些耗电工业得到更好的配合。

水电和工业配合的问题也是水电的长远规划问题。水电的长远规划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许多水电站的建设，不仅具有发展电力的意义，而且往往能够促进一个地区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

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因此，在水电规划中，一方面要有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要求眼光要放远大一些；一方面要尽量避免所谓“远水不救近火”，努力使水电建设和当前的需要相结合，同时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决不应忽视和放松那些关系重大的远景目标。

在去年大跃进中，水电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五个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全国在施工中的大中型水电站总容量达到一千多万瓩。这就说明，我国水电建设已经迈开了很大的一步，已经搭下了一个很大的架子了。去年水电勘测、设计、施工人员创造了许多的先进经验和革命措施，使得水电站的施工速度加快了一倍，造价降低了一半还多。当然，目前水电建设中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是很紧张的，这种困难是我们的事业在高速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在设计和施工中更好地节约原材料，继续开展技术革命，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善于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回避困难，而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我国水电建设今后是一定能够得到更大发展的。

世界水力资源的总蕴藏量约三十八亿瓩，七十多年来，已经开发的约一亿三千万瓩，主要在北美洲和欧洲；水力资源最丰富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得到开发。我国的水力资源目前只开发了不到千分之三。我们应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我们这一代，首先将最



經濟的最好開發的水力資源千千萬萬地開發出來，讓水電站遍布全國，改造自然，造福人民。

當然，如上面說到的，水電為主、火電為輔，這是要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夠實現的方針，而不是在三五年之內就可以全部實現的方針。在目前，以至在今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為着適應國家建設對電力的迫切需要，我們必須積極發展火電。以為我們的長遠方針是水電為主、火電為輔，就要在目前集中力量去大辦水電，而忽視

火電的建設，其結果必然使我國電力的生產不能適應經濟建設高速度發展的要求，這種作法是不對的。但是，如果因為目前時期為了適應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多發展火電，就不認真考慮發展水電的遠景規劃，不充分利用我國水力資源非常豐富的有利條件，不積極進行各項有關水電建設的准备工作，不進行目前條件下可能和必要的水電建設，以便逐步提高水電在整個電力生產中的比重，這種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片面性，也是必須避免的。

附：名詞解釋

容量（瓩）

容量是計算電力生產能力的標準。常用的計算單位是“瓩”，每一瓩的發電能力等於一點三六“馬力”。一個電站的發電容量（也就是它的生產能力），決定於電站內所安裝的發電機的數目和大小，所以有時又叫做裝機容量。

發電量（度）

發電量是計算電力生產數量的標準。常用的計算單位是“瓩小時”，通俗稱為“度”。每一瓩的發電容量每小時可以生產一度電。每一度電可以供一盞二十五瓦（瓦是瓩的一千分之一）的電燈用四十小時，或供一馬力的電動機用一點三六小時。

年利用小時

年利用小時是計算發電設備利用程度的標準。每一瓩發電設備，在一年內如果生產了三千度電量，它的年利用小時就是三千小時。如果一瓩設備全年生產了五千度電量，它的年利用小時就是五千小時。因為一年內只有八千七百六十小時，所以發電設備的最高年利用小時是八千七百六十小時。事實上由於用電需要經常有變動，發電設備還需要定時的檢修，不可能全部經常得到充分利用，一般年利用小時遠低於這個最高數字。各個電站的設備年利用小時是不一樣的。有的高些，有的低些，這是由電站在電力系統中的運行方式所決定的。



自动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

——楊重光——

在美国一家罐头工厂的車間里，橫列着象火車一样的半自动化車床。車床的傳送帶长长地連接在一起，不停地蠕動。在“火車”的这一头，一个女工两手用每分鐘三百五十次、每小时二万一千次的速度把切成小片的白鉄皮飞快地推送到車床上。在“火車”的另一头，一听听密封好了的食物罐頭不停地跳出来。女工們被机器的轟鳴声震得头昏脑脹，刚想把两手放下来休息一下，但是拿着計时表的監工在背后吆喝着：“赶快做！赶快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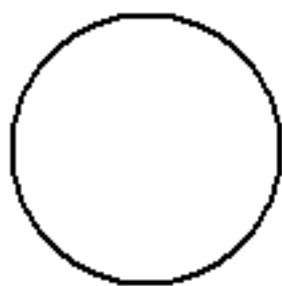
女工們每天九小时干着这种折磨人的劳动。当她在被折磨得衰弱不堪和半瘫痪的时候，她就被資本家抛弃了。于是一个新来的女工頂替了她的位置。在这个原来有好几百工人的工厂里，实行自动化以后，只剩下几十个工人了。很多工人被新机器排挤掉了。在美国劳动力市場上有几百万失业者等候着工作做。老板們是不愁找不到年青力壯的劳动力的。

在现代生产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化是重要的成就之一。自动化不仅能大量节省人的体力，而且生产管理中的某

些脑力活动也能被自动控制系统所代替。自动化能使劳动生产率一般增加两倍到十倍，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增长三十倍或五十倍。如果没有自动操縱，原子能研究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原子核反应堆的建造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自动化却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現象已經永远消灭，失业已經根除，任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都是有利益于劳动人民的。列宁在論述英国化学家南姆賽发明的从煤层中直接取得煤气的方法时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南姆賽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縮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日，例如从八小时縮短到七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鉄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霧、灰尘和泥垢之苦，能很快地把肮脏的令人厌恶的車間变成清洁光亮的、



人类所应有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和电气取暖设备，就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免于把一生的四分之三的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泛地实现生产自动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劳动条件，急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自动化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还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自动化的条件下，可以根本地改变劳动的性质，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人的作用将归结为管理和调整各种自动机器和仪器，以及制定工艺过程的各种程序、制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自动化的社会后果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列宁在《论述南姆赛的发明的同一篇文章中》说：“这一变革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是绝对不能比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愈益加重和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从这一伟大发明上所获得的利润，将流入摩根、洛克斐勒、利亚布申斯基、莫罗佐夫一班人的荷包，以及他们的随从如律师、经理、教授之流的资本奴才的荷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是机器的奴隶，劳动人民的尊严受到最大的伤害。自动化的运

用不能不把工人从劳动中排挤出来，抛到工厂的大门外，不能不使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严重而尖锐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广泛采用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装备而来的，通常是大大加强劳动强度，因为每个工人所照管的机器增加了，机器的操作速度也加快了，工人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了。归根结蒂，自动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各种矛盾。马克思说得好：“在现代的恶劣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免要加深社会的对立和加强社会的对抗。”（“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技术的进步反而使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的威胁，自动化逼使更多工人丢掉饭碗。譬如：美国克利夫兰城一个日产一千架无綫电的半自动化工厂，一九五五年的时候雇用了二百名工人，一九五八年实行了完全的自动化，就只用四个技术人员来进行工作了。美国布雷福福特城一家制造凝固汽油的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原来有好几百人工作，现在一共只有五个工人，每天生产六十五万磅凝固汽油。这些工厂里多下来的工人到哪里去了呢？交了“好运”的到农场、小工厂打临时工去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只得在纽约城的失业救济所门前，在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工厂的铁栅门外，在华盛顿的街道上蹒跚地徘徊着……。最近尽管很多工厂的烟囱重又冒烟了，但是失业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难怪最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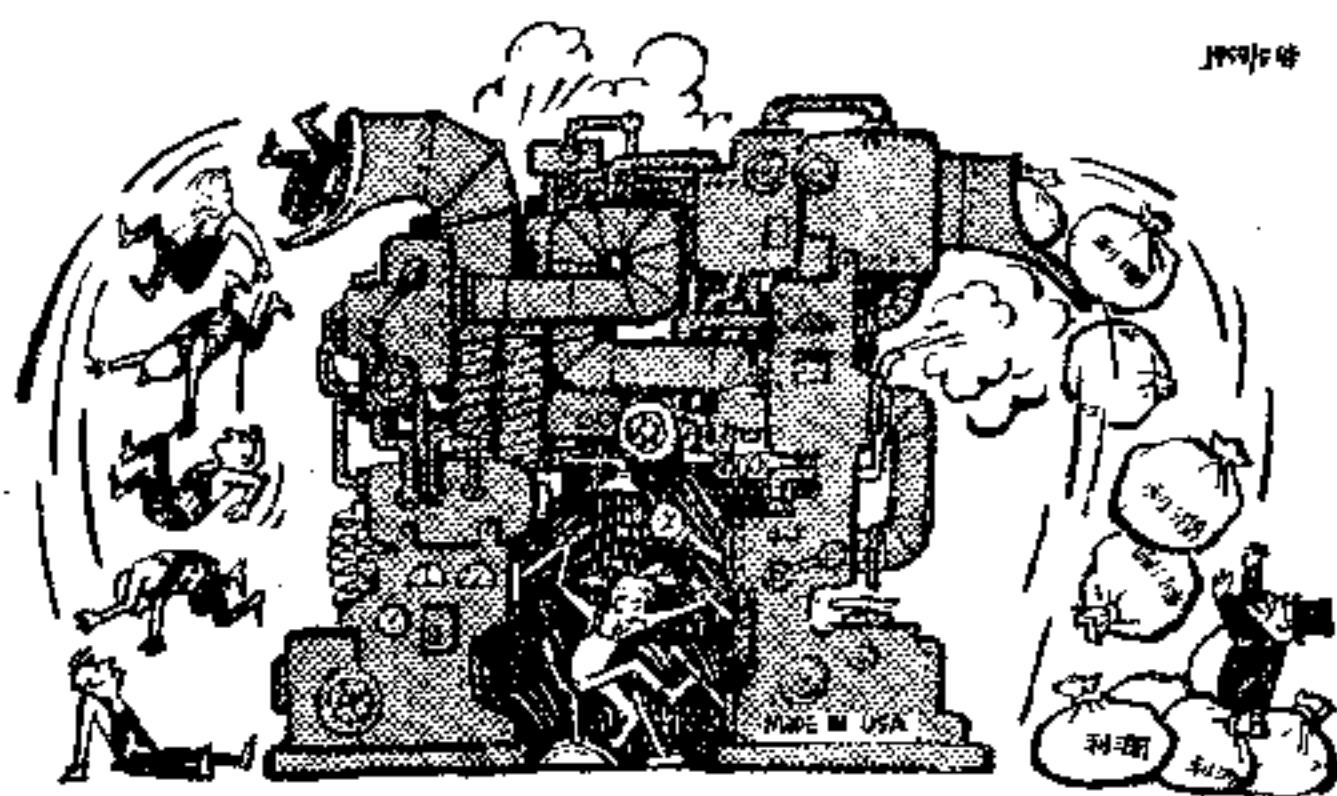
紙、刊物和广播，越来越多地談論着工厂实行自动化以后所引起的社会后果。三月三日英国“新聞紀事报”刊登一篇从华盛顿寄去的通訊中，冠以这样的标题：“再度出現繁荣(?)局面——但是机器窃走了工作”。文章承認：“这說明美国的一种残酷的新現象：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失业人数也在上升。”又說資本家“并没有及雇工人，却是减少工人和大量进行超时工作，或是轉而实行自动化。”美国工业公司董事长斯奈德三月九日对記者說：“在現在登記失业的人中，大多数将依然失业，而且将失去受雇的可能。事实上他們的人数还要增加。技术的进步和企业单位的規模越来越大促使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去年美国“新共和”杂志在一篇文章中用确实的数字証明：假如在二十年的時間內，在美国全部工业系統中采用自动化的机构，平均每年只要增加百分之五，那么“每年就至少会有三百万工人失去工作”，結果将是“絕對失业和整个經濟

的萧条”；即使按照目前采用自动化的速度，所造成的失业也会是“数字庞大、具有經常性而且从后果上說是絕對沒有前例的。”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在自动化企业中为每

一单位产品所偿付的工資比非自动化企业要少得多，这就使資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工人們受到进一步的剝削。正是在垄断資本家对利潤的貪得无厌的追求之下，在美国、英国、西德、法国等資本主义国家，近年来自动化趋势有了很快的发展。这在美国表現得特別明显。据不完全的統計，美国一九五四年購買自动化設備計三亿美元，一九五五年是五亿至六亿美元，一九五六年达十亿美元。而目前，据“劳联—产联”副主席路德說，“技术的加速度前进的运动正在繼續着”，加速实行自动化，“現在在整个美国的冶金工业、汽車工业、航空工业、紡織工业、电力工业、建筑业——在工业的各个部門进行着。”

在自动化的工厂中，按电鈕的工作代替了大部分的体力劳动，人們通过仪表、灯泡之类来監視复杂的操縱盘。这样，照理可以大大減輕工人的劳动，但是在資本主



米 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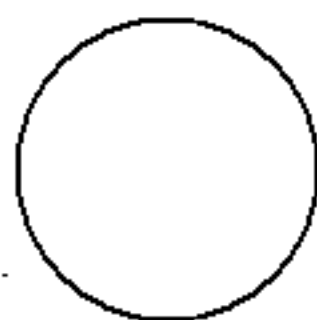


义制度下,情形恰恰相反。由于资本家追逐最高限度的利润,工人虽然是从事着操纵灯泡和管理各种仪表的工作,但是在机器速度加快的情况下,这种工作也会象最吃力的体力劳动一样使人精疲力竭。一九五六年,“纽约时报”曾用这样的话描写美国自动化车间的工作情况:“福特汽车工厂最后几根传送带上所装配的发动机,每十二秒钟就会掉落一个,在这样快的速度下,工人就只好用胳膊肘和肩膀交叉着动作,来完成这一严格规定的工作,这就活象在‘摩登时代’电影中卓别麟所演过的那个著名角色一样。”欧洲劳动生产率委员会公布法国雷诺汽车工厂自动化专家的报告说:“在自动化机床传送带上工作的技师,比一般正常的中等速度的工作要紧张得多。”美国耶鲁大学在一个关于自动化研究的报告中说:“新的机器消灭了令人痛苦的苦工,但是为了监视工作和指挥工作而需要的紧张使得工人‘神经不安、敏感’。……”资本家在工厂里推行的所谓“赶快制度”,使工人因过度紧张而产生极度的疲劳。例如法国的西姆卡汽车工厂,由于工人劳动过于紧张,以致要设立一种所谓“气体(氧气)室”,让那些被“赶快制度”弄得疲惫不堪的人恢复知觉。在法国的某些冶金企业中,为了使工人能够赶上压榨机的工作速度,竟将工人的双手捆在机器上。在这种情况下,工伤事故就大大增多。在美国,一九五六年死于工伤事故的工人有一万四千三百人,受伤的有四百三十五万人,其中有二百万人部

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在法国,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小时发生工伤事故六百零七次,每天有八人因此死亡。意大利在一九五六年工伤事故中,死亡的达五千人,造成永久残废的达十五万九千人,受伤的有一百零一万人。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和疲劳,工人未老先衰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今年三月十六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失业男女来说,日历是一个敌人。尽管纽约和其他各州有种种成文规定,禁止由于年龄而加以歧视,但是那些超过三十五岁——甚至有許多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丝毫没有减少他们这样的看法:他们最大的障碍是他们变得成熟和学到本领的那些年头。”尽管技术已经变得熟练,资本家却不愿雇用三十五岁上下的“老头”。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动化也是资本家反对工人运动的一种武器。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保罗·艾因济格就说过:“用机器代替人力有助于削弱工会讨价还价的力量”。

今天,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手段是更加巧妙了。四十多年前美国工程师弗列德里克·泰罗所发明的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和今天垄断资本家实行的那种“科学”制度相比,显然是望尘莫及了。这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艺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日益更加发展了那些使劳动人民陷于雇佣奴隶地位的



社会条件。”

自动化象一面鏡子，从这里人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資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自动化帶給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后果，已經引起了資本主义国家工会組織和国际工会組織的广泛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总決議中就說：“垄断組織，由于竞争与追求更大利潤的規律的驅使和促使資本主义矛盾尖銳化的工人斗争的威胁，正在工业、商业和机关内实行现代化和部分自动化（在某些国家里則实行农业机械化），其目的在于加重他們对工資劳动者的剝削，以便尽快从他們庞大

的投資中得到利益。这种情况对失业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工人在就业、工資、职业訓練、工业安全和健康等方面蒙受了严重的后果。工人階級必須靠統一行动来消除技术进步带来的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并制止过度的剝削，以便爭得較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面对着实行自动化的可怕后果，正在更加奋发起来，加强工人队伍的团結，进行反对压迫、反对垄断資本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



藏民的控訴（木刻）

李喚民作

